

特邀 Contributions Invited

- 圍繞著新型冠狀病毒的中國「疫苗外交」
——美中爭霸的走向／松本春香 2
- 當只有一種站立模式被允許的時候
——中國工人殺馬特的審美與抉擇／歐子綺 8
- 《殺馬特，我愛你》導演李一凡映後座談紀錄／歐子綺編輯 10

師生田野紀要 Research Notes

- 從杭州良渚文化村看中國基層社會治理／陳巧育 15
- 初探台灣寺廟用地問題與兩岸宗教交流／邱冠瑜 18
- 台灣虱目魚政治製作的成與敗：產業該如何轉型發展？／楊峻杰 21
- 從一個社造團隊看台灣青年回流政策／楊士學 25
- 全球供應鏈重整——野寶企業的未來發展／葉潤泰 28
- 精準扶貧誰得利？——從台一農場在貴州畢節之經營初探
中國扶貧政策落實／丁德維 31
- 兩岸的和平女神：媽祖信仰與兩岸交流帶來的認同矛盾／游佩宣 34
- 中國對台灣地方政治的影響和滲透
——台南市立法委員郭國文訪談／朱鑒漢 37
- 猜不到的不知所措：兩岸關係劇變下之台灣民宿業經營／陳彙淳 40

演講與工作坊紀要 Lecture & Workshop Flashes

- 宗教超然或宗教促統？跨海峽道教信仰互動的多重場域和行動邏輯
／張貴閔 44
- 過江菩薩出洋……去／劉宇光 47
- 主流聲音之外——中國獨立紀錄片發展史／聞海 50
- 「變局中國」座談會／吳介民、林宗弘、古明君、沈秀華、陳明祺
陶逸駿、黃兆年 54
- 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China 新書發表會／徐斯儉、蔡欣怡、
張鈞智、林宗弘、古明君、鄭志鵬、陶逸駿 59
- 中國集體抗爭研究的幕後告白／陳志柔 62
- 最孤獨的一代——中國城市中老年人社會化空間的民族誌研究
／紀思婷 65

—特邀—

圍繞著新型冠狀病毒的中國「疫苗外交」 ——美中爭霸的走向

松本春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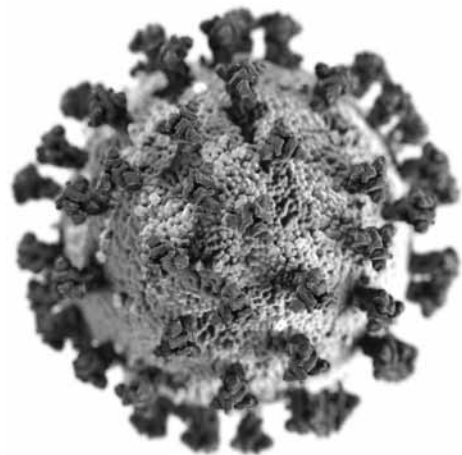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前言

「中國的疫苗是協助對抗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的『春雨』，目前正在悄悄地滋潤全世界」——2021年2月中國農曆新年（春節）黎明時分，中國國營媒體新華社發表了一篇中文報導，自稱中國正式展開的「疫苗外交」對國際社會作出了貢獻。¹ 儘管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起源於武漢，但很多人應該對中國的這種態度感到不舒服，例如為自己的應對措施作為功績自賣自誇等。然而，正如這篇報導所言，中國在全球率先積極採取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措施，並在國內外採取加強宣傳工作的姿態。

近年來，中國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國際支援日漸擴大。² 直到2020年3月底，中國透過所謂的「口罩外交」等方式向全球120個國家和多個國際組織提供口罩、防護衣、PCR 檢測試劑盒、呼吸器等緊急醫療支援。此外，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後不久，中國就積極從事疫苗研發並進行臨床試

驗等，2021年2月「疫苗外交」也正式展開，為國際社會提供了許多疫苗。³ 基於上述情況，本文以近期中國的「疫苗外交」為焦點，闡明其現狀和意圖。同時也兼論後新型冠狀病毒時代美中爭霸的走向。



新型冠狀病毒的超微結構型態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ARS-CoV-2_without_background.png

- 1 〈新華國際時評：中國疫苗、助力全球抗疫的「春雨」〉新華網、2021年2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2/24/c_1127134941.htm）（2021年10月20日訪問）。此後註釋的訪問日期和時間省略，但所有這些都是在2021年10月20日最後訪問的。
- 2 關於圍繞冠狀病毒的最近中國動向，請參考拙文〈看準後新型冠狀病毒時代美中霸權之戰的中國外交攻勢〉《東亞》第636號、2020年6月號、同〈中國國內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起源的情況〉《東亞》第639號、2020年9月號、同〈冠狀疫情後美中關係一以形成新的國際秩序為目的的中國〉佐藤仁志編著〈受冠狀疫情影響的開發中國家和世界的轉變——針對相互摩擦的國際秩序、分裂、不平等和貧困的思考〉（日經新聞社、2021年）。
- 3 2021年5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全球健康峰會上發表演說，透露中國向全球供應的新冠狀病毒疫苗數量已達3億劑。〈習近平出席全球健康峰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2021年5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5/21/c_1127476428.htm）。據新華社報導，此後中國疫苗供應量持續增加，7月份達到約6億劑，約佔世界總量的6分之1以上。此外，根據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公告，到2021年8月下旬，中國的疫苗接種次數將超過20億次。

美中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光明與黑暗

關於中國對 2019 年冬天發生在湖北省武漢市的新型冠狀病毒的應對，由於當局的隱瞞而被認為對最初態勢的控制有所延遲。⁴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漢市執行封城，此後中國各地採取全面封鎖措施遏制病毒。在新型冠狀病毒於全球迅速蔓延的同時，中共政府決定全面展開大規模 PCR 檢測，並積極透過智慧型手機 App 管理個人健康資訊並進行限制以遏制該病毒擴散。因此，中國是最早成功控制病毒的國家，從 2020 年 3 月左右開始，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向國際提供緊急醫療支援的國家。在全球多國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而陷入困境期間，中國向義大利、塞爾維亞、東南亞、非洲、中南美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伸出援手。

另一方面，自從冠狀病毒在全球蔓延以來，美國一直在苦心應對國內情況。再加上川普政權強調「美國優先」，美國早已被迫延遲對其他國家的國際支援至今。⁵ 雖然共和黨川普在 2021 年 1 月將政權移交給民主黨拜登，但同年 2 月下旬美國死亡總人數已超過 50 萬，據報導數量超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越戰的死者總人數。⁶ 目前，在拜登政府的領導下，美國正在試圖透過加速疫苗接種進行重建，但仍然大幅落後中國的「疫苗外交」。

美中兩國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問題上的光明與黑暗浮上台面後，隨即展開了一場直指其本質的爭論。曾在歐巴馬政權時期擔任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之後在拜登政權時期擔任印太

協調員的庫爾特·坎貝爾 (Kurt Michael Campbell) 是美國亞洲政策的關鍵人物，他在新型冠狀病毒全球流行之際為《外交》雜誌做了一個有趣的撰稿 (合著)，⁷ 講述後新型冠狀病毒時代美中霸權之爭對世界秩序形成走向的影響。

其中，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蔓延進一步加速了川普政權的「美國優先」，而在美國國內被迫做出反應的情況下，坎貝爾等人分析說，美國已經錯過了發揮全球領導力來克服這場危機的機會。相比之下，中國正試圖透過填補美國力量的真空而迅速採取行動，將自己定位為全球領導者。最重要的是，坎貝爾等人表示，是中國最初的錯誤隱瞞才助長了未知病毒大流行危機的嚴重性。他們還進一步指出，在未來，如果美國繼續沒有能力或有意願發揮它的能力，中國將發揮領導作用，21 世紀美中爭霸的力量平衡很可能會發生變化。

根據坎貝爾等人的分析，以往支持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地位的不僅是他們的財富和權力，也基於以下三個條件：1. 實施良好的國內治理、2. 為國際社會提供全球公共財、3. 提升國際危機的應對能力。坎貝爾針對迄今為止美國政府反應的嚴謹分析，顯示新型冠狀病毒讓「支撐美國領導地位的這三個條件都受到挑戰」。

事實上，中國從疫情初期就開始重視疫苗開發，認為其有可能發揮全球公共財的作用。武漢封城後不久，農曆春節的 2020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討論預防新型冠狀

4 作為中國初始動態延遲的分析，參考磯部靖〈中國為何對冠狀病毒的初步對應出現失誤——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困境〉Wedge Infinity、2020 年 3 月 30 日 (<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19130>)。加茂具樹「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的政策流程——初步行動和新政策問題的設定」日本國際論壇 (<https://www.jfir.or.jp/j/activities/studygroup/2020/china/210228.htm>)。

5 2020 年 12 月 8 日，川普總統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優先為美國人接種政府採購的疫苗。“Trump to order priority access to U.S. COVID-19 vaccines for Americans,” *Reuters*, December 8,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health-coronavirus-vaccines-trump-idUKKBN28H2LN>)。

6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More Than 500,000 American Lives Lost to COVID-19,” February 22, 2021,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22/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more-than-500000-american-lives-lost-to-covid-19/>)。

7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 China Is Maneuvering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s the United States Falter,” *Foreign Affairs*, March 18,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3-18/coronavirus-could-reshape-global-order>)。

病毒感染的措施。總書記習近平在大會中指出，面對疫情蔓延，必須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同時強調，「要加強對傳染源的追查和病原學檢測分析，抓緊研發治療藥物和疫苗」。此外，次日 26 日，中央應對新型冠狀肺炎對策指導小組召開時，李克強總理也強調了疫苗研發的重要性，並呼籲「必須匯集專家科研人員，也借助民營企業共同努力，進行疫苗的研發，爭取早日在疫苗研發上取得突破」。⁸

此外，2020 年 5 月 18 日，習近平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第 73 屆世界衛生大會（WHA）開幕式上發表演說：「一旦中國完成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發並開始使用，它將成為世界的公共財」。⁹ 李克強在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延遲兩個多月後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2020 年 5 月 22 日至 28 日）的國內外記者會上表示：「我們必須控制傳染病，推進疫苗、有效藥物和檢測試劑的研發。這些是人類戰勝病毒的有力武器，是世界的公共財」。¹⁰ 亦即，當中國製造的疫苗在初期階段取得成功時，中國就已表明將其變成「世界公共財」的意圖。

圍繞中國「疫苗外交」的意圖 ——在「兩極化」的夾縫中

中國在如上所述的國家領導下，以國營的國藥集團（中國醫藥集團）和科興生物（科興控股生物技術）等為首的疫苗研發進展迅速。¹¹ 2020 年 3 月底，中國疫苗在武漢啟動臨床試驗，擴大了國內外臨床對象。然而，由於此後中國的感染受到抑制，中國製造的疫苗便轉而到感染蔓延的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印尼、巴西等地進行了大規模臨床試驗。

國藥集團雖然宣布其疫苗有效率達 79%，但由於尚未公佈臨床試驗數據，很多方面並未證明其有效性。¹² 2021 年 4 月 10 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CDC）負責人高福（George Gao）主任認為「中國製造的疫苗不是很有效，需要改進」，為此，他說「我們必需要採取調整劑量、增加施打次數或混合不同技術製成不同疫苗等措施」，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的波瀾。¹³ 此外，根據 2021 年 6 月《紐約時報》報導，塞席爾、智利、巴林和蒙古等地因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再次擴大，已漸漸造成許多問題，其中已經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接種了兩次中國疫苗，其中一些國家正

8 上述中國應對冠狀病毒的詳細情況，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2020 年 6 月 7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81801/1681801.htm>）。

9 習近平演說內容（全文）見下文。“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opening of 73rd World Health Assembly,” May 18, 2020, Xinhua Net（新華網英語版）。（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5/18/c_139067018.htm）。

10 〈李克強總理出席記者會並回答中外記者提問〉2020 年 5 月 29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premier/2020-05/29/content_5515798.htm#1）。

11 關於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發，與中國的反應迅速相比，不得不說日本明顯落後。日本政府在 2020 年底以後，開始著手支援國內疫苗的研發機構與製藥公司，疫苗與治療藥的研發費用被計入 2021 年 1 月底成立的 2020 年度第 3 次追加預算。2021 年 6 月，也就是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一年半後，內閣決定制定一項國產疫苗研發和生產的國家戰略。

12 中方展示的這個數字低於據說有效率 90% 以上的美國輝瑞和莫德納的疫苗，但超過了 WHO 疫苗認證標準的 50%，有一定的有效性程度是公認的。關於此，參考“Covid: What do we know about China's coronavirus vaccines?” BBC News, January 14, 2021（<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5212787>）。

13 這則新聞在中國成了一大話題，但次日中國國內所有相關文章都被刪除了。“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vaccines ‘not high’ and needs improvement, top health official say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1, 202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vaccine-efficacy-not-high-gao/2021/04/11/dafe3ab6-9a8f-11eb-8f0a-3384cf4fb399_story.html）. 根據報導內容指出，有人低估了科興疫苗的有效性，低至 50% 左右。最近，科興疫苗對 Delta 毒株的極低效力已成為東南亞等地的問題。

在考慮額外接種別種疫苗。¹⁴ 但是，中方直接否定這種說法。同年 7 月，中國國營媒體《環球時報》引用西班牙報導稱施打兩劑中國製疫苗的有效率達 83.5%。¹⁵

撇開中國疫苗有效性的爭論不談，2020 年 12 月底以來，隨著中國國內疫苗正式認證的推進，加速了「疫苗外交」的推進。¹⁶ 截至 2021 年 2 月，中國政府已向包括巴基斯坦在內的 50 多個開發中國家免費提供中國疫苗，並向 20 多個國家出口。¹⁷ 同時，中國決定透過 WHO 主導的 COVID-19 Vaccine Global Access (COVAX) 機制提供 1000 萬劑疫苗。同年 3 月，中國向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 (PKO) 人員捐贈 30 萬劑中國製疫苗，並準備優先在非洲使用。¹⁸ 此後中國對國外疫苗的供應不斷增加，到 2021 年 4 月左右，中國外交部宣布已透過各種方式向 100 多個國家和國際機構提供中國製疫苗，以抑制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擴散。¹⁹

目前一些資金相對充裕的國家正在推行「疫苗民族主義」，目的在於確保本國人民早日獲得群體免疫，這造成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也就是「有疫苗的和沒有疫苗的」明顯兩極分化，

而中國的「疫苗外交」便是透過修補國際社會的疫苗差距來推動的。²⁰ 對此，英國科學雜誌《自然》指出，雖然中國疫苗正在幫助解決全球供應短缺問題，但仍然質疑中國疫苗缺乏臨床試驗數據。²¹ 2021 年 5 月至 6 月期間，WHO 批准了兩種中國疫苗的緊急使用，預計這將解決 COVAX 供應短缺問題，並有望實現向低收入國家大規模分配疫苗。國際社會仍然面臨著疫苗短缺的嚴峻現實，許多國家需要中國製造的疫苗也是事實。

至今為止，中國對新冠病毒包括「疫苗外交」的相關國際支援，是極具地緣政治戰術上的戰略意義，並且隱藏透過這些支援的另外意圖。例如，眾所周知，中國於 2020 年 3 月早就提供緊急醫療援助的義大利，也是中國至今推動「一帶一路」倡議 Group of Seven (G7) 的第一個成員。此外，長期以來以巴爾幹半島南部戰略要地著稱的塞爾維亞也參與了「一帶一路」倡議，並得到了與義大利同樣的支援。當時，塞爾維亞總統亞力山大·武契奇 (Aleksandar Vučić) 指責歐盟 (EU) 限制醫療器材出口，稱「歐盟團結只是一個童話」。²² 2021 年 1 月中旬，塞爾維亞決定接

14 “They Relied on Chinese Vaccines. Now They’re Battling Outbreak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3,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22/business/economy/china-vaccines-covid-outbreak.html?utm_campaign=wp_)

15 〈接種兩劑後有效率達 83.5%！西班牙媒體：中國科興疫苗防禦效力非常好〉『環球時報』2021 年 7 月 12 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3tyMbrEvvL>)。

16 關於中國在東南亞的「疫苗外交」，參考相澤伸廣〈中國疫苗外交走近東南亞：貫徹獨立性與多角化的印尼和泰國〉，中央公共理論，《中央公論》2021 年 5 月號。

17 從 2021 年 2 月 1 日起向巴基斯坦提供中國產疫苗開始，陸續向汶萊、尼泊爾、菲律賓、緬甸、柬埔寨、寮國、斯里蘭卡、蒙古、巴勒斯坦、白俄羅斯、獅子山共和國、辛巴威、赤道幾內亞等開發中國家的援助。也開始向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摩洛哥、印尼、土耳其、巴西、智利、塞爾維亞等出口疫苗。“China vows more COVID-19 vaccin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February 1, 2021, *Xinhua Net*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2/01/c_139713741.htm)。

18 “China to donate 300,000 doses of COVID-19 vaccines to UN peacekeepers,” March 16, 2021, *Xinhua Net*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3/16/c_139812780.htm)。

19 〈王毅談疫苗應成為全球公共產品：我們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外交部、2021 年 4 月 21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68305.shtml>)。

20 根據中方表示，截至 2021 年 2 月，中國開始正式全面「疫苗外交」時，世界疫苗分佈呈現嚴重兩極分化，130 多個國家無法取得新冠病毒的疫苗。參考上述〈新華國際時評：中國疫苗、助力全球抗疫的「春雨」〉。

21 Smriti Mallapaty, “China’s COVID vaccines are going global: but questions remain,” *Nature*, May 4, 202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1146-0>)。

22 Zachary Evans, “Serbian President Labels European Solidarity ‘Fairy Tale’, Says Only China Can Assist in Coronavirus Response,” *National Review*, March 16, 2020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news/coronavirus-outbreak-serbian-president-aleksandar-vucic-labels-european-solidarity-fairy-tale-says-only-china-can-assist-in-coronavirus-response/>)。

受歐洲首支中國製疫苗，進口 100 萬劑國藥集團的疫苗。²³ 隨後，東歐的匈牙利也批准了該疫苗，並決定進口 500 萬劑。²⁴

2021 年 2 月中旬，有消息指稱台灣（中華民國）採購美國輝瑞疫苗的談判因中國阻撓而破裂。²⁵ 同年 3 月下旬，中方接觸了與台灣有邦交的南美國家巴拉圭，要求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以作為接受中國製疫苗的條件。²⁶ 同年 5 月，隨著迄今為止一直被抑制的新型冠狀病毒在台灣開始蔓延，國台辦再次提出中方願意提供疫苗。²⁷ 與此同時，2021 年 5 月下旬，蔡英文總統透露，就在與德國生技公司（BNT）簽訂契約之前的疫苗採購計劃因中方阻撓而中斷。²⁸

如上所述，從中國「疫苗外交」的軌跡中浮現出的就是最近熱議的「經濟方略」²⁹ 構圖，也就是說這可能是中國試圖透過提供中國疫苗的經濟手段，來獲得地緣政治的利益。這裡所說的中國地緣政治利益無非是擴大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或許可以進一步解讀為中國正試圖透過展示其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主動性，在後新冠病毒時代的美中霸權鬥爭中取得領先地位。



中國病毒滅活疫苗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inopharm_COVID-19_vaccine_\(2021\)_B_\(cropped\).jpe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inopharm_COVID-19_vaccine_(2021)_B_(cropped).jpeg)

結語

2021 年 4 月，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機構雜誌的《求是》中對於目前世界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發展形勢時表示：「目前世界持續處於『動盪』（混亂）的狀態。關於應對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被問到各國的領導能力和政治系統優勢的

23 “Serbia becomes first European country to use Chinese COVID vaccine for mass rollout,” *Reuters*, January 19, 2021 (<https://jp.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serbia-vaccine/serbia-becomes-first-european-country-to-use-chinese-covid-vaccine-for-mass-rollout-idUSKBN2901M5>). 此外，同年 5 月，中國國防部透露已向塞爾維亞軍隊提供了援助疫苗。〈中國軍隊向塞爾維亞軍隊提供新冠疫苗〉中國國防部、2021 年 5 月 19 日 (http://www.mod.gov.cn/topnews/2021-05/19/content_4885706.htm)。

24 “Hungary becomes first EU nation to use China’s Sinopharm vaccine against COVID-19,” *Euronews*, February 26, 2021 (<https://www.euronews.com/2021/02/24/hungary-becomes-first-eu-nation-to-use-china-s-sinopharm-vaccine-against-covid-19>)。

25 〈BNT 允供台灣疫苗卡在代理權〉《中國時報》中時新聞網 2021 年 2 月 19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219000379-260114?chdtv>)。

26 〈中製疫苗爆條件是『與台斷交』友邦巴拉圭批損害主權〉《自由時報》2021 年 3 月 23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476044>)。

27 此外，2021 年 5 月下旬，上海復星醫藥集團和上海市醫藥衛生發展基金會相繼提出向台灣提供疫苗。之後，當日本政府表示準備向台灣提供部分英國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的契約疫苗時，中國外交部強烈反對該疫苗不應被用作政治工具。

28 〈中國阻我購 BNT 疫苗國台辦：向原廠買是『不循正途』〉《自由時報》2021 年 5 月 27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548656>)。

29 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New Edi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2020. 長谷川將規『經濟安全保障—經濟如何用於安全保障』日本經濟評論社、2013 年。

時候，時間和勢頭都在我們這邊」，強調了中國獨特的優勢和自信。³⁰

拜登總統正在美國內部加速疫苗接種，並試圖重建美國，因為美國和中國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方面存在競爭。2021 年 5 月，他宣布將在 6 月底前向海外供應至少 2000 萬劑美國製造的疫苗。³¹ 與此同時，拜登表示「我們將成為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彈藥庫，就像美國在二戰期間是一個維護民主主義的彈藥庫一樣」，表現出提供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更多疫苗的意圖。此外，7 月上旬，拜登出席在英國舉行的 G7，宣布將向開發中國家和其他國家提供 5 億劑疫苗。³² 今後，美國能否以「疫苗外交」捲土重來受到舉世矚目。

另一方面，2021 年 3 月，拜登總統在就職後的第一次記者會上承認「美中之間的競爭現在是

民主力量和專制力量的較量。」³³ 不可否認，「美中新冷戰」形勢即使政權交替，也可能會持續下去。³⁴ 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美中爭霸的關鍵之一就是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疫苗本身很可能成為大國之間權力政治的「遊戲規則改變者」，同時留下新的挑戰，例如處理變異病毒和圍繞專利處理的問題。³⁵ 今後我們將勢必持續關注圍繞「疫苗外交」的國際關係和美中衝突。

〔謝辭〕本文是修正刪改發表於《國際問題》第 702 號（2021 年 8 月、40～47 頁）的部分日語論文後翻譯成中文的內容。我要感謝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允許我轉載這篇文章。我還要對鄭志鵬教授和吳介民教授對本文發表的協助表示誠摯的感謝。

30 習近平〈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求是》第 9 期、2021 年 4 月 30 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4/30/c_1127390013.htm）。

31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COVID-19 Response and the Vaccination Program,” The White House, May 17,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5/17/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covid-19-response-and-the-vaccination-program-4/>).

32 “Biden says biggest vaccine donation ‘supercharges’ battle against coronavirus,” *Reuters*, June 11, 2021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healthcare-pharmaceuticals/biden-announce-donation-500-million-pfizer-doses-urge-others-join-2021-06-10/>).

33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Press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3/25/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press-conference/>).

34 關於習近平政權期的「美中新冷戰」與圍繞中國的國際關係，請參考拙編《美中新冷戰與中國外交—東北亞強權政治》（白水社、2020 年）。

35 黃延中表示，疫苗可能會成為未來大國的遊戲規則改變者。Yanzhong Huang, “Why Mass Vaccination in the West Could be Bad News for Chinese Leaders: To narrow the immunity gap, China could be forced to prioritize its domestic vaccine needs,” *Think Global Health*,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ecember 10, 2020 (<https://www.thinkglobalhealth.org/article/why-mass-vaccination-west-could-be-bad-news-chinese-leaders>).

—特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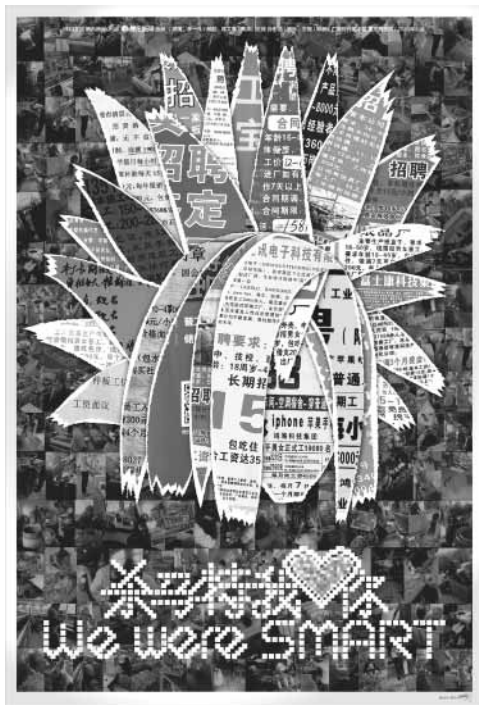
當只有一種站立模式被允許的時候 ——中國工人殺馬特的審美與抉擇

歐子綺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重新進入視野的殺馬特

2008 年前後，一群以豎直、鮮艷、誇張的頭髮和動漫造型為身份標誌的工人群體，出現在中國沿海的工業區。他們是殺馬特，藉著獨特的審美造型迅速地崛起；2013 年前後，殺馬特文化在網路上遭遇嘲諷、撲殺，急遽地消失在世人的眼前。2020 年底，世界仍在疫情的籠罩之中，李一凡所執導的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在線上影展放映，殺馬特因此再度進入人們的視野之中。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海報¹

逃離農村、進入工廠

多數殺馬特在年紀非常小的時候，就輟學打工，為了「逃離」中西部的農村，也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李一凡導演藉由訪問七十八位殺馬特，串成這部以殺馬特自述為中心的影片。影片的序曲，不是直接討論殺馬特的造型或文化，而是定焦在工人的身份。電影畫面分為三格，直式的殺馬特視覺生活世界，似乎是為了手機觀看和傳播而存在。其中一格是工人的自述，另外兩格穿插著工業區的招工廣告或工人等待進廠的側拍。

離開農村，進入工廠，是進入另外一個牢籠。在工廠裡面對的是嚴格管控，上廁所難、請假更難，無止盡的加班，站著都能睡著。工人把手機帶進工廠，拍下工作的場景和實況，李一凡導演剪輯這些畫面成為影片的一部分。工人述說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劇照

1 特此感謝李一凡導演提供《殺馬特，我愛你》電影海報與劇照供本刊刊登。

著工場的經歷，搭配著機器敲打的声音、藥水或油漆浸入身體的畫面。在工業區租房子，找不到路，處處被欺騙。工廠裡外，盡是害怕、孤獨、壓抑和脆弱。殺馬特藉由髮型武裝自己，因為看起來像個「刺蝟」或壞孩子，就不用怕被欺負。

「以為頭髮能改變一個人」

殺馬特整出奇異的髮型，是為了保護自己，但特殊造型不只是威嚇其他人，也是為了吸引關注。把頭髮立起來、讓自己更獨特，因為「你不正常，才有人關心你，別人有話題跟你說」。影片裡受訪者李雪松說，在髮廊裡，殺馬特對頭髮要吹整染燙的「角度、高度、層次、紋理」，都有十分細緻的講究，簡直要把髮廊老闆逼瘋。另一個殺馬特說，為了愛護特殊吹整的髮型，他晚上要用一個拳頭枕著睡覺，甚至使用特殊的枕頭保護造型。殺馬特安曉惠說，女孩造型特殊，去了溜冰場會有男孩來拉手；頭髮成了自我的延伸，「以為這個頭髮能改變一個人」。玩殺馬特讓這群工人感到特別自由，「我是有個性的，和我父母、和其他廠裡的人不一樣。」

「玩殺馬特都是家人」

透過殺馬特造型，這些工人不僅有了安全感、獨特性，還找到了可以相互依靠的家人。殺馬特覺得彼此同心、能聊到一塊，只有殺馬特能相互理解，體會到真正的親情感。殺馬特之間建立了虛擬的親屬關係，成立動輒上萬人的殺馬特家族 QQ 群，彼此相互信任。李一凡導演要透過殺馬特「家族」，才能找到殺馬特。影片中總共七十八位受訪者，其中七十六位受訪者都是透過殺馬特的核心人物羅福興轉介，才答應接受訪談。導演在座談中透露，他們團隊自己「搞定」的受訪者，只有兩位。

對於殺馬特而言，殺馬特家族是神聖的。即便拍攝的當下，許多殺馬特已不再玩殺馬特，但是保有對殺馬特身份的驕傲和執著。導演說，如果沒了家族，就算還能看到打扮類似殺馬特造型



導演李一凡與受訪者

的人，那只有頭髮而已，真正的殺馬特已不復存在。

如果說，《殺馬特，我愛你》的前半段，呈現的是殺馬特自我認同與群體榮耀形塑的過程；影片後半段，則驟然轉進網路世界對殺馬特全面的污辱、攻擊、打壓。一群人透過「自黑」殺馬特的短片，假扮且嘲弄殺馬特，甚至潛入殺馬特的 QQ 群、取得管理員身份後踢除殺馬特的成員。沒有人能說得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殺馬特做錯了什麼，是誰決定消滅他們的生存空間。導演在映後座談中說，是一種在 2008 年之後形成的「集體無意識」，決定了這樣的發展。在「中產階級化、精緻化」的集體無意識之下，打壓殺馬特文化是必然的。

敏感的身體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仰賴著數以千萬計的工廠工人、建築工人、非正式經濟的勞動者。沿海工業區的工廠工人，始終是中國研究文獻的焦點。從潘毅的《中國女工》（*Made in China*）到 Jenny Chan, Mark Seldon 和潘毅合著的 *Dying for an iPhone*，新工人階級的形成、勞動體制、城鄉變遷、社會不平等，長久以來是學界關注的焦點。

相較於生產線上的工廠工人，殺馬特群體處在更加非主流而邊緣的位置。如同李一凡導演所說，一開始他不確定這群人是否真的存在，如果不是遇到了羅福興，也不知道怎麼去找到這群人。

殺馬特和其他階層，即使住的地方近在咫尺，卻是相互隔絕的。如果說，從農村到城市打工的青年是城市的邊緣人，殺馬特則是邊緣中最為奇異的存在。李一凡導演認為這些工人之所以選擇成為殺馬特，是因為他們的身體還敏感、尚未被徹底規訓、還不願意妥協。

「此生不進工廠」

也因此，李一凡導演非常反對採用「次文化」的視角來理解殺馬特。無論是殺馬特在工廠裡的孤單和痛苦，選擇成為離開工廠的代價，甚至是透過快手和抖音影片轉向商業的掙扎。²對李一凡導演來說，只有全盤接受殺馬特的生活經歷，理解他們的人生邏輯，才能真正的看見他們。如同郭佳所主張，殺馬特並非「以『形式的反叛』來逃避現實處境」，玩殺馬特是「一個『完整的人』所需的對美的追求」。³

理解工人在工廠裡的處境、痛苦、和自我質疑，是理解殺馬特的基礎。要成為殺馬特，這群工人面對進廠賺錢或自由兩者之間的抉擇。一旦要進廠，就得剪頭髮、成為「正常人」，才能面試。但是，做了頭髮，就能夠和其他工人不一樣，成為另外一個人。

單純染燙頭髮，並不是殺馬特。導演說，殺馬特是不一樣的，頭髮一定要是立起來的，「要有足夠的貧乏、足夠的壓力，才會選擇足夠的誇張」。「頭髮在人在」，如果要回到到工廠、就得剪頭髮，「把自尊丟了」，於是殺馬特寧可挨餓，選擇自由。如果沒有極為殘酷的勞動，不會有極端的選擇。殺馬特和墜樓的富士康打工詩人許立志，是對於同一處境不同型態的回應。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劇照

只有一種站立模式被允許

在近來關於「躺平」的討論之前，被稱之為殺馬特教父的羅福興，似乎已經看見內卷化時代的來臨。作為工廠工人，不管怎麼努力，也買不了車、更買不了房；他直截了當地說：「玩殺馬特我有上升的機會，當普工沒有。」

然而，當初的殺馬特回到了家鄉，父母已經老邁。李一凡導演說，殺馬特「沒有資格躺平」，只能再去打工。和當初的殺馬特相比，今天工人的處境，似乎更加沒有抉擇的空間。李一凡導演直言：「當你被規定成只有一種站立模式的時候，其他站立模式都是非法的時候，所以今天就躺平了，不做了。」

2 〈作為第二代農民工的殺馬特：和《殺馬特，我愛你》導演李一凡的對談〉，《中國勞工通訊》，2021年2月19日。取自 <https://www.clb.org.hk/zh-hans/content/作为第二代农民工的杀马特：和《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的对话>。

3 郭佳，2019，〈追問新工人文化：從「新工人藝術團」形塑「新工人階級」之文化行動入手（下）〉，《人間思想 第十一輯：作為方法的五十年代》，人間出版社。

—特邀—

《殺馬特，我愛你》導演李一凡映後座談紀錄

講者：《殺馬特，我愛你》導演李一凡

與談人：劉子愷（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前言

2020 年底，《殺馬特，我愛你》這部特殊的電影、連同其奇異的主角殺馬特，出現在許多線上影展。《殺馬特，我愛你》經導演授權，2021 年 6 月 3 日在政治大學歐子綺老師所開設的「移民與全球化」課程上公開放映。映後座談邀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劉子愷老師擔任與談人，及開放學生提問。此次座談採線上會議方式進行，下文為座談會之問答節錄。¹

殺馬特：足夠的貧乏，才有足夠的誇張

劉子愷老師：

第一個問題，想問導演影片所展現的，是誰的「次文化」？第二個問題，為何「殺馬特」很重要？第三個問題，當「殺馬特」在勞動者的日常領域消失時，為何「殺馬特」還是重要？對誰而言是重要的？第四個問題，我想問的是直播主，我們剛剛看到，羅福興透過抖音或是快手的平台所呈現的「殺馬特」，是否成為一種被剝削的「數位勞動者」？最後，「殺馬特」的打工者與《淹沒》片中的被迫遷居者，有何共通點？導演的手法想反映中國當代社會的哪些面向？

李一凡導演：

我先談他最後一個提的問題，就是奉節的移民和殺馬特有什麼關係。實際上我的這兩個片子之間，也拍過一個《鄉村檔案》的片子，是關於

奉節農村的狀況。我覺得要談殺馬特、要談《鄉村檔案》、要談《淹沒》，其實都得回到一個特別巨大的話題，就是中國從八〇年代開始進入全球資本主義貿易系統，特別是從 2000 年、加入 WTO 以後。

離全球資本主義特別近的地方，總是發展的、特別高效的、能夠進入整個系統。你可以看到長三角、珠三角、聖保羅、巴西里約，剛剛我們舉的以上國家、地區，都有超大城市出現。但好處跟距離是有限的，我覺得像在日本、韓國或是台灣，這種城市化好處的輻射，還是比較容易達到的。

但土地幅員非常廣闊的地區，像是在中國內陸、印度，城市化、現代化的好處根本沒有辦法輻射到這些地方。這些地方希望獲得現代化的好處，唯一的辦法就是出去打工，或是像《淹沒》那樣，作為能源的生產地，你必須為發展讓路。在現代化過程中間，偏遠地區、底層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我再補充兩句。其實當年做三峽水電站，它的電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輸往上海還有長三角的，所以輸出勞力和輸出能源是一樣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想回到「是誰的次文化」的問題，我們大陸說「誰的亞文化」問題吧。我覺得「誰的亞文化」的提法，還是挺沒意思的。為什麼我覺得挺沒意思呢？實際上我去尋找殺馬特是非常困難的，從 2012 年，我開始想找到殺馬特去拍，就一直找不到，就只能在網路上看見他們。

1 本文經李一凡導演審閱。特此感謝李一凡導演提供《殺馬特，我愛你》電影海報與劇照供本刊刊登。

其他人從來沒見過真正的殺馬特，都只是在網絡上看見的，所以很奇怪。我們也不知道成千上萬殺馬特是真實的存在，只知道他們是在 QQ 群。

當我 2017 年到找到羅福興的時候，才發現其實他們就在東莞、就在深圳，甚至離我那些朋友居住的地方，只有十幾、二十公里遠的距離。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好、有錢的階層也好，就那麼一點距離，其實是相互隔絕、根本沒有來往的。而且我們的互聯網，不管是社交網絡，或者是快手、微信之間，是沒有連接的。我們到最後，是到了東莞的石排鎮居住的時候，我們的快手推送忽然發生了變化。我們當時註冊了快手，才發現了有很多、很多工廠的推送開始出現了。所以後來為什麼能夠看到他們，首先是我們發現它的推送變了，以前根本不會讓你看到工廠，所以我覺得是碎片的。

我們沒有去理解，或是我們根本沒有願意去理解過，他這種文化也好、或者他們的人生邏輯性。是不是他們人生是有邏輯的？他們的生活是不是有邏輯？他是不是不知道推利避害？他們選擇了一個很傻逼的、就是要去自己受折磨嗎？肯定不是這樣的。我們把他們首先當成一個什麼、什麼樣的文化，次也好、亞也好，本身就是一種他者的眼光。

我把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合在一起。今天的殺馬特，它像以前那樣到處有的狀況，是已經沒有了。以前不管是東莞的石排鎮、汕頭的人民公園、浙江的溫州附近，都還有不少的殺馬特。但這兩年就幾乎完全沒有了，幾乎是很少、很少人看見。

殺馬特的概念，其實有一些我們理解上的不同，或是有一些誤解。殺馬特有時候指的是一個人，有時候是講一個家族，有時候是講一個誇張的審美風格。我採訪到最多的人，他們告訴我：真正的殺馬特有一個特點，就是頭髮是立起來的。你雖然說染過黃髮，但你頭髮沒有立起來、沒有足夠的誇張，其實你不算殺馬特，你只叫非主流。這是有一個區分的，我覺得這個區分非常重要，就是說，你要有足夠的貧乏和足夠的壓力，你才會選足夠的誇張。這個和你沒有選到那麼誇張，

是不同的。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我覺得殺馬特真正的核心其實是家族。每個殺馬特都跟我講這句話，「永遠不進工廠」，這是第一句他們最愛講的話。第二句話：他們從不在網上作賤自己。他們把殺馬特看成神聖有意義的東西，對他們來說是個家，他們不會作賤自己的家。所以當殺馬特這個群體消失，我們在網絡上看見殺馬特，其實他只有殺馬特的外型，就是只有這個頭髮，他首先失去了家族的關係。所以家族的消失，就意味著殺馬特的消失。今天在網上，更多的只是以殺馬特的外型來獲取、甚至是作賤自己來獲取些報酬的。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工人都轉向了網絡，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或整體改造，現實中的發洩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會通過人設來發洩，就是通過自己在網絡設定的形象、在網上發洩，這在今天成為了主流。我們當時拍過一些，因為我用手機鏡頭拍的，所以有些問題，後來沒有使用。你會看到，譬如在有一些工廠，上班之前，成千的工人蹲在地上，都在玩手機、都在看短信。

你會發現，最以前譬如在廣東的珠三角以外的地區，有從那個地方來的工人，中原地區、河南、河北、湖南、江西這些地方，都有殺馬特。但是逐漸地，最後的殺馬特都停留在雲南、廣西和貴州這三個地方。這和這些次發達地區的人，越來越被規訓、身體越來越不敏感，是有關的。反而在偏遠地區的人，他們的身體還保持著敏感，對身體不舒服有反應。其實殺馬特在我們見過的工人裡，是更敏感、稍稍要更文藝的人。

姦安同學：

導演好，因為你說在 2016 年認識羅福興先生，所以才開始發展這個拍攝題目。我想問，是因為認識羅福興先生，才讓你有拍攝動機？還是在跟他互動之間，讓你萌發拍攝的想法？第二個問題，在片子比較後段，講到網民會去攻擊殺馬特族群，或是進入他們的 QQ 社群，去干擾他們的社群，自己成立了一個自己的網路。殺馬特開始回歸到比較正常的髮型，或是改成用線上的視頻，在我看起來比較像是被驅趕的感覺。除了他們這些比較被動的行為以外，有沒有一些比較

主動去反抗或對抗的行動？

李一凡導演：

我其實一直想找到殺馬特，但是找不到殺馬特。我的朋友圈，還有我的數碼推送，從來沒有給我機會，所以我根本就沒找到。我是在 16 年認識羅福興以後，我真正認識的殺馬特只有三百多個，而且真正願意接受我們訪談的，只有七十八個，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七十八個裡面，有七十六個是透過羅福興介紹的，完全沒有羅福興的關係、被我們自己搞定的，只有兩個，所以他們對於其他人，是非常小心的。

第二個問題是對殺馬特的打壓。到底是什麼原因，我不清楚，然後我問殺馬特們，殺馬特們也不知道。但是我覺得 08 年以後，整個中國大陸的文化逐漸中產階級化和精緻化，而且那種所謂的正能量和向上，成爲一種集體無意識，是必須這麼做的。所以打壓他們，我覺得是很正常。有沒有一個命令，這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集體無意識已經形成。

渝安同學：

導演您好，剛剛聽到您關於他們對家的歸屬感，是殺馬特這個群體形成家的感覺。這讓我想到歐美文化裡面，像是酷兒這樣的群體，他們也是因爲一些心理壓力，或是外界不接受的次文化，自己形成一個家的感覺，所以他們對家的界線比較沒有那麼傳統。我想要請教的是，這些殺馬特因爲他們年紀很小就已經脫離原本的家庭，他們之後在這樣的人生經歷當中，對於原本家的感受是怎麼樣的？不知道有沒有問過他們這部分的事情？

李一凡導演：

殺馬特普遍跟原生家庭都有問題、都不太好。幾乎我們碰見的所有人都是留守兒童，就是他小的時候在家裡是跟爺爺奶奶長大，父母在外面打工。幾乎跟父母都是有相當多的問題。然後他們在平均、大概 14 歲的時候，進入到城市，從一個鄉村的熟人社會脫離，突然到一個陌生社會的時候，他們真的是非常難以適應。

所以我覺得殺馬特這種獨特的審美吧，或是誇張的審美，非常有意思。這種誇張的審美，居

然就把類似的經歷、類似的文化、類似的處境的人，召集在一起。在中國，平常我們在城市裡看到的社群，一般是家族或者是老鄉關係，很少會看到要求以一種髮型、一種審美來連接。我覺得殺馬特是非常獨特的，在中國、在當代文化裡，它是最早用審美的方式把大家鏈結在一起的一個群體。所以他們的家，跟我們平常的那種家，是不同的。

孟廷同學：

殺馬特的次文化已經很難被看到了，會不會中國有另外一種文化，像是殺馬特一樣，可以提供這些工人或是邊緣群體的心靈支持？

李一凡導演：

我是沒有看到這樣的。

孟廷同學：

我想問「三和大神」跟殺馬特的關係，或者是那種凡爾賽的文化，算是一種 immigrant 的文化嗎？

李一凡導演：

「三和大神」首先是一團的，裡邊有幾種。有一種是打工的時候，特別是打零工的人，他們覺得被騙了，所以他願意做日結工。第二種是我們在片子裡面看到，非常多的工人，他們覺得打工是沒有意義的、不能解決問題。那一年我們在東莞，看到大家穿的 T-shirt，最有名的 T-shirt 就叫「何以解憂，一夜暴富」，只有這樣一個路徑。所以就有大量的工人去賭博，希望通過一夜暴富的方式發財，這樣有很多的工人是因爲賭博輸掉了大量的工資，或是身分證都押掉。他們也沒辦法回家，他們也沒辦法去進廠，所以就到三和那個地方去做日結工，被稱爲三和大神。三和大神是一個非常被動的狀態，跟殺馬特一個主動的連接和自我組織，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個，凡爾賽也好、亞 B 也好，還有很多、很多這種躺倒文化，就是不進工廠、不工作，傳導到大城市，是因爲我們這種超大城市和不公的模式。有更多的白領，在大城市也沒有意義，生活也沒有意義。我們的處境跟殺馬特是一樣的，都是沒有意義的。只是我們沒有勇氣，像殺馬特一樣，去做那種改變身體跟現實中的事情。

惠文同學：

我在看電影之後，上網看一下羅福興的資料，說他自己在承受大眾的輿論之後，覺得壓力很大，因為很多人在黑這個群體，所以他就主動想要退出。在您訪問的過程當中，這些群體回憶過去那個時候的自己，他們的想法是什麼？我看很多人都是很留戀，有人像羅福興一樣，曾經或是現在還會想要擺脫那個身分嗎？因為很多人都反對這個群體。

李一凡導演：

兩種都有。一種人是非常懷念當年的社群，或者是家的感覺，這個我覺得是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人，比如當年加入殺馬特是一種流行，所以當殺馬特不流行時、大家都恨殺馬特的時候，他也跟著恨殺馬特，這樣的人，也是有；甚至他們也去打殺馬特，這樣的人也都是有的。這個影片裡，我們看到鍾馗養鬥雞的，他就有這個經歷。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剛剛開始談的集體無意識。羅福興也知道有人在消費，但是他也沒有別的話語權，所以他覺得消費他的人賺到錢也挺好。

倩盈同學：

剛剛導演提到中國年輕人內卷化跟躺平，這個應該是中國年輕人跟殺馬特態度可以比較的地方。（內卷化跟躺平）最近真的很紅，我很想問導演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李一凡導演：

實際上殺馬特不能真正的躺平。因為在中國的農村，大概人均耕地只有一畝左右，所以一個家庭要生存，要派一個人出來打工。以前殺馬特小的時候，都是他們的父母在外面打工，但是今天工廠都有很多規定，譬如48歲、50歲以上就不能招了。所以他們的父母都必須回到家鄉，大部分殺馬特都需要出來打工，來養活這個家庭。我們前幾年看到那些回到鄉下的，這兩年已經幾乎都又出去打工了。所以對於殺馬特來說是沒有資格（躺平）的。

孟廷同學：

我覺得殺馬特這種文化，比較像一個功能性的文化，它提供一個感情出口給農村兒童。如果這種文化消失的話，那農村到城市打工的人，他們心態會不會被影響？或是比起當時有這個文化的時候，他們變得更壓抑了？

李一凡導演：

我說它就是內卷。當你被規定成只有一種站立模式的時候，其他站立模式都是非法的時候，所以今天就躺平了，不做了。我已經回答過，工人沒有東西。現在工人的狀況，工人都管得非常的嚴，不管是NGO或是什麼，都管得非常的嚴。關於工人，很多事不能做。

（逐字稿：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生陳品鴻、編輯：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歐子綺）

— 師生田野紀要 —

從杭州良渚文化村看中國基層社會治理

陳巧育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在 2019 年這趟師生田野中我們用了兩天的時間參訪杭州基層社會治理。在這幾個社區治理案例中，我們觀察到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等多元主體的互動關係，以及它們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位置與職能。社區居委會負責承接上級單位延伸下來的事務，它有行政、動員黨員以及社區自我管理的職能；業委會則是由社區業主自己組成的委員會，可以藉此討論社區公共事務或是調解鄰里糾紛；物業管理公司則是承接居委會或是業委會委託的事項，作為社區維護管理等服務的提供者並定期收取物業費。

每個社區的發展歷史和條件不盡相同，因而有各自特殊的發展軌跡和相應的治理方式。這篇田野紀要聚焦在良渚文化村的治理經驗，因為我們在良渚文化村待了一整天的時間，和各方代表進行了比較完整的訪談，對這個社區的狀況有較為充分的認識。良渚文化村是新建設的社區，居民參與治理的能力和意願都比較高，也因為業委會和居民的能動性較高，物業公司必須較為謹慎地提供服務，而居委會在其中扮演一個隨時掌控社區狀況、並適時以公權力介入發揮影響的角色。

良渚文化村的建設歷程與村民公約

良渚文化村最早是由南都集團在 2000 年前後著手開發，2006 年由萬科集團接手建設，並且由萬科集團提供物業管理服務。萬科集團作為地產商，為吸引客戶入住，投入開發許多配套設施，包括度假酒店、村民食堂、幼兒園、醫院、教堂和文化藝術中心等。位居市郊的地理位置加上高

比例的住宅配套設施，良渚文化村吸引到許多高社經背景的住戶。隨著住戶人數逐漸增多，開始出現環境和停車問題等衝突，當時一位「村民」提出制定社區規範來共同維護公共秩序的想法：

村民公約它是 2008 年，有一位村民提出來，我們良渚文化村這麼好的地方、世外桃源，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村規民約。當初提出叫良渚憲法，他這個想法提出以後，在網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那麼線下呢，那時候是萬科主導、組織的，開村民代表、業主代表討論，我們制定這樣的一個村規民約。據統計，開了 18 次的座談會。（田野訪談，良渚文化村社區黨委書記）

2011 年 26 條村民公約制定完成，被譽為是中國國內第一個真正自下而上發起的社區公約，內容多為保持禮貌、維護環境、重視環保這類的規範。在制定過程中有村民的實質討論，也有物業公司（萬科）從中協助組織。公約制定完成後，萬科持續投入資金、辦公室等資源協助推動公約落實。現在，這 26 條村民公約成為良渚文化村村民自治的金字招牌，這不僅是對社區居民的柔性規範，同時也是構建村民認同感的重要來源，不管是網路或紙本的相關宣傳，或是於交流過程中，筆者時常察覺到社區居民對村民公約的讚賞。

為什麼良渚文化村可以成功推動村民公約？首先，良渚文化村是由萬科主導開發的大型社區，業主多為高社經階層，他們對生活品質有一定要求，也較有餘裕和意願來推動、參與社區事務。其次，雖然在村自治的招牌下，村民被認為是完全的自下而上推動公約，但實際上企業在其中扮



村民公約的制定過程與條文內容被刻在社區公共空間展示

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身為村民代表的受訪者甚至提到萬科起了主導的作用，他認為萬科大力協助推動與落實村民公約，符合該企業所塑造的品牌形象與企業價值。最後，村民公約的籌劃時間大約在 2008~2011 年之間，而社區居委會則是在 2012、2013 年左右才進入良渚文化村。居委會成立之後，也認為目前的自治型態對社區治理有益無害，因此抱著樂見其成、順勢而為的態度。

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三駕馬車

在村民公約的制定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村民主體和企業主體的作用，而在 2012 年居委會進入後，良渚文化村進入中國社區治理中所謂「三駕馬車」並進的情況。三駕馬車分別是社區居委會、業主委員會和物業公司，各自代表了政府、社會與市場三方力量。這三架馬車要如何共同前進？受訪的居委會代表認為關鍵在於彼此關係是否和諧，倘若關係理的順，馬車就能順利前進，反過來說，如果關係不和諧，那社區治理就會浮現很多矛盾。居委會代表提到不同小區的業委會作風各異，最理想的狀況是由業主選出來的業委會主任同時具備黨員身分，或者是能盡力和居委會保持順暢溝通者。而最糟的狀況則是業委會主任不聽取居委會的指導，三駕馬車各行其是：

當然也有一個不好的小區，他這個成立業委會，他覺得自治，我是當家作主的、我（是）主

人，他就對社區的建議、意見也不給理睬……，他越權，或者是不作為，都是產生一個矛盾……。他也不是黨員，他也沒跟社區保持聯繫……，他就是（覺得）我是業主選出來的，我要自治的，我要自決的，我自己的事情要作主……。（田野訪談，良渚文化村社區黨委書記）

在中國，社區自治組織得以運行是因為黨下放部分權力到基層，讓渡一些空間給基層社會去做事，這種社會治理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居民的自治需求，例如他們可以協商部分社區公共事務、可以組織各式文化體育社團。但同時，社會組織不能「太過自治」，他們被期待要和政府保持良好且順暢的溝通關係，因此黨員身分在自治組織中顯得相當重要，其被認為是自治組織和公權力之間的一種橋樑。



與良渚文化村業委會及村民代表進行座談

化解矛盾、強化控制

上文提到，由業主所組成的業委會經常扮演調解鄰里糾紛的角色：

這個就是我們（過去）的鄉村呢，叫鄉賢，一般還是依靠這種制度，就是你有幾個熱心的主持公道的人出來做調解，那還要幾方配合，比如說物業、開發商、社區，幾方面配合做這個事情，那就能夠化解一些矛盾。實際上這也就是我們國

家講的那個楓橋經驗，就諸暨楓橋那個地方，把矛盾化解在基層。（田野訪談，良渚文化村業委會代表，2019年11月7日）

而有些業委會無法解決的鄰里衝突，就必須透過居委會出面，因為居委會具有公權力色彩，可以比較強硬的解決問題。在業委會和居委會代表的言談中，一個很大的共同點是他們都經常把「產生矛盾」和「化解矛盾」掛在嘴邊，從中可以感覺到，在當今中國社會中最極力避免的就是矛盾，因為矛盾的存在相當危險，它意味著對社會穩定的衝擊。而中國政府推動基層社會治理，一個主要的目標就是透過基層社會的力量讓各種矛盾盡可能被預防或化解。近年來新推動的網格化管理便是依循這個邏輯，將社區細分為數個網格，每個網格由相應的網格員負責，建立責任機制來擴大對社區各種訊息的控管，從而強化社會控制與穩定。

結論

這次我們獲准參訪的都是整體而言發展良好的樣板社區，我們看見居委會對於上級任務的承接，例如垃圾分類、「最多跑一次」的單一行政窗口以及各式黨建活動，我們也在這幾個社區中

看到居住品質的整體提升和社會組織提供服務的現況，同時了解到在中國所謂「社區自治」的政治意涵為何。另外，中國政府現在積極推動基層社會的網格化管理，我們在社區內也有看到許多相關宣傳，不過此行沒有實際接觸到網格員，是較為可惜的部分。筆者認為未來在研究中國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時，可以多關注網格員的具體工作內容，以及基層社會對於自治的想像是否隨著不同的實踐而有所改變。



清大社會所師生與協助我們參訪的浙江省委黨校老師於良渚文化村內合影

—師生田野紀要—

初探台灣寺廟用地問題與兩岸宗教交流

邱冠瑜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台灣的宗教相當多元，每個不同的宗教各自具有其特色。在台灣的鄉村中，佇立著許多廟宇，廟宇是地方社會的信仰和活動中心，人們的社會生活和宗教生活緊密扣連。近年來中國積極的參與兩岸宗教活動交流，也有出現過台灣的寺廟提倡「兩岸一家過好日子」，甚至是升五星紅旗，但是中國國內卻有許多摧毀寺廟和教堂的事件，中國政府積極打壓宗教自由也是越來越明顯；爲了要理解中國對內打壓宗教、對外卻參與宗教交流的情況，我們找到了從事宗教行政工作的報導人作爲訪談的對象。

這次的田野訪談對象爲林振祿先生，其自民國 94 年起曾經擔任過台南縣政府民政局宗教禮俗科科長爲期 6 年，其後並曾擔任台南市麻豆區區長，現爲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宗教禮俗科科长。這次的訪談過程中，他與我們分享許多自身在地方行政上的行政經驗，特別是宗教問題，受訪者談到南部多信奉王爺，受訪者也跟我們分享他在這些廟宇本身、廟宇和地方社會、廟宇和政府之間的互動和折衝。以下筆者會分幾點說明廟宇繼承、

廟宇水土保持、廟宇土地設定、廟方主委選任、兩岸宗教交流等訪談問題。

廟宇繼承問題

台灣有許多歷史悠久的廟宇，其中許多廟宇的土地產權並不直接屬於廟方。這是由於以往虔誠的信徒不僅捐獻錢財，也捐獻土地給神明建廟，但是當時社會並沒有簽訂法律文件的習慣，大多是個人與廟方達成口頭同意之後，廟方就會開始向信徒募款、建廟。

經過世代流傳，寺廟已經座落在原本的位置許久，地方上的居民也視爲理所當然。然而隨著社會及法律制度的變遷，過往信徒透過口頭捐獻給廟方的土地，其土地使用和財產權卻不受現今法律所承認及保障，因此這些信徒的後代子孫依法可以主張自身對於土地的產權並請求廟方搬遷。受訪者提到這些廟宇並沒有辦法以過往與信徒之間的口頭約束作爲依據，依照現今法律取得土地的財產權，往往只能透過訴訟作爲解決土地糾紛的最終手段，因此政府在司法程序之前，就必須在宗廟和個人間幫忙協調和溝通。

廟宇水土保持問題

另外，受訪者也提到許多廟宇、道場、寺院建立的位置與環境水土保持發生衝突，受訪者認爲這些廟宇會被認爲破壞水土保持有幾個原因：第一個是廟方在選擇地點時，往往會選擇山凹處，因爲在風水民俗觀念中，神明可以把兩個山頭當



受訪者與清大師生分享自己對宗教事務的觀察

作座椅的扶手，坐在山凹處時會比較舒服，所以當廟方在選擇土地時會以這類地形為優先考量；第二個則是因為原本的廟宇建立在山下，但是隨著信徒越來越多，廟方需要更多的土地供給信眾修行，於是沿著山坡往上開闢，把原本用地擴大。綜合來看，山凹處是河川所切割成的地形，廟方等於是占用河川用地，可能會影響河川結構，再者，廟方沿著山坡開墾後會容易導致土石鬆動，一旦遇到惡劣天氣容易發生災害。受訪者說，在他從事宗教行政的工作時，需要面對許多類似的問題，這些與水土保持息息相關的問題不僅僅攸關廟宇本身的安全，更是關於整體環境與社會的公平正義。

受訪者認為應對這個問題最好的方法是透過聯審制，把相關的專家學者集合為廟方做評估，否則廟方如果要符合法規必須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和資源，因此受訪者提倡聯審制，綜合專家學者的意見後，讓廟方的土地使用和安全問題可以改善。

廟宇土地設定問題

以往廟宇多建設在鄉村周圍，隨著時代發展，國家開始把土地分類（建地、農地、工業用地…等），因此現有的寺廟在土地分類上主要分佈於「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山坡地保育區的農牧用地」、「林業用地」、「特定農業區」或森林地區的「林班地」等非都市土地。這些土地有部分被寺廟佔用

公有地（吳惠巧，2011），由 TVBS 在 2018 年的報導可知：

據農委會公布的 106 年全國農地盤查結果，全台遭宗教寺廟竊佔之平地 and 山坡地，分別為 1055 公頃和 2015 公頃；另根據國產署清查，非法佔用公有地的宗教建築，從 2009 年的 2189 筆，到今年 4 月增為 3220 筆，面積多了 116 公頃。

受訪者提到，依據現行法令規定，農地禁止建廟，於是原先座落在農地上的廟宇，只能透過土地變更來合乎法令規範，否則將被政府裁罰。

但是由於土地變更需要相關的專業知識和資源，許多有心人士便趁機詐騙廟方，在土地變更的行政程序前，對各宮廟按件收費，允諾廟方可以協助處理廟宇土地變更事宜，但是到最後因為許多原因無法變更，廟方不但失去金錢，廟宇也不保。還有許多在重劃農地上的廟宇，由於農委會對於在重劃農地上的違建廟宇非常堅持，不能讓宗教建築輕易變更，否則會讓許多同樣非農業用途的工廠、安養院…等佔用農地的狀況也合法化；至於都市土地變更就更為麻煩，原本屬於都市土地的農業區，必須要透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才能變更為宗教專用區。依據法令規定，這類的土地變更需要繳交給政府回饋金（3~5 成），一般廟宇須給付的金額通常是五百萬起跳，或是透過捐贈土地而不繳回饋金，不管是金錢或是土地都是廟方的資源，並不容易能夠拿得出來，這是位於都市土地的違建廟宇現階段面對的最大問題。

廟方主委選任問題

台灣目前廟宇的主委選任大多有以下幾種：法人制、管理委員會制、執事會制、管理人制。以台南為例，以前的鄉鎮長在縣市合併後就無法透過選舉來獲得重要政治職位，因此地方上的廟宇就是他們新的政治標的，一旦取得廟方主委的職位後，就可能透過程序上的操弄來讓自己成為終身主委；甚至現在廟宇因為難以透過正式管道獲取金融借貸，所以廟方容易接受外來的力量投資捐獻，這會導致廟方的管理、決定事務的方向被外部力量介入和干擾，也曾經有過廟方主委用廟方名義及信徒捐獻的香油錢，以較市價便宜的價格購買廟宇附近的農地，之後擅自以市價轉賣給他人，並未告知買家土地是廟方所有的狀況下，從中賺取之間的價差。受訪者認為，現階段要有效解決這類問題最妥當的方法就是執事會制的推廣，由信徒推舉幾名住持擔任一般執事，再由一般執事推舉大執事負責管理廟方的運作和相關儀式的進行。

兩岸宗教交流

訪談過程中，我們也詢問了有關於兩岸宗教交流的情況。受訪者以自身經歷跟我們分享，過去台灣曾經有幾個比較知名的寺廟前往中國與北京宗教局長協商，在兩岸推廣佛教、召開兩岸佛教論壇。受訪者提到我們的代表只需要負責出機票錢，抵達中國後中方會負責落地招待。受訪者表示，通常到中國的幾天中大多行程屬於參訪，真正的論壇時間並不多，而近幾年的兩岸交流被中華道教聯合總會取代，當中華道教聯合總會來到台南後，舉辦活動時並沒有通知中央與地方單位，即便透過關係了解也問不出相關資訊，整個活動相當的封閉、不公開。受訪者也談到地方廟宇之所以會開始從事兩岸交流的活動大多因為主委的個人意見，通常由主委說服大多較為年長長輩的管理委員會成員之後，便開始主導籌辦兩岸交流的相關活動。對於上述現象，受訪者認為不見得每間廟宇的所有廟方人員都知道而且贊同自己的廟宇參與兩岸交流，而廟方招待中國來訪的人員也都是用信徒捐贈的香油錢，受訪者認為這樣做並不妥當；且受訪者觀察到某些廟宇的兩岸宗教交流會隨著主委的更換而停止，據此判斷這些廟宇所進行的兩岸宗教交流並不是廟方全體的需求，而是主委個人的意見和決策。

結語

從這次與受訪者的交流中可以了解到，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中宗教發展的概況。從訪談的脈絡中可以發現，廟宇是台灣社會中重要的文化，但隨時代變遷，和國家理性化官僚組織的發展速度相比，宗教是落後於此的。法律和行政部門常常無法直接了解廟宇和居民的行動邏輯，例如宗教廟宇位置的選定通常是神明選擇的，但是國家的土地使用或是水土保持等行政措施，都是依據

科學知識而運作，於是在兩者的衝突中，要怎麼互相調和便成為重要課題，國家需要考量良好的土地規劃以及環境保護，廟方則考量一畝適合神明和信徒修行的土地。我們該怎麼去思考和理解兩者的決策過程及其背後的行動邏輯，並取得良好的平衡點，是可以持續關注的。

在這次的訪談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廟方本身的管理結構，訪談中可以了解到宗教組織管理階層的選定和商業公司的模式不同，法律並沒有辦法如規範企業一般完整地規範每間廟宇主委選任程序的一致性和公平性；與土地問題相似，國家的官僚組織和宗教組織運作的邏輯不盡相同，隨著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政府與宗教組織必須要更完整的彼此了解和包容，否則就會產生諸多法律和社會問題，如：萬年主委、廟方被外來勢力介入管理…等，以上兩者現象都不符合理想的宗教自由的想像，如果政府總是把宗教當作是行政體系之外的領域，採取消極的態度而不對宗教組織積極進行治理，那傷害的不只是廟方，更是對一般虔誠信徒的傷害，他們的權益不僅僅會受損，更可能被有心人士操弄。

當廟方的管理結構健全時，才可以將宗教的核心信仰進一步推廣，在兩岸宗教交流中，台灣宗教界在接收中國給予的資訊時，才有能力應對中國透過宗教交流滲入的政治目的，在相對單純的宗教與文化交流中控制這些政治目的所能發揮的作用。



清大師生與受訪者合影留念

—師生田野紀要—

台灣虱目魚政治契作的成與敗： 產業該如何轉型發展？

楊峻杰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台南虱目魚契作與中國統戰的關係，一直存在著爭議。從 2011 年中國開始與台南虱目魚產地簽契作，「假契作、真統戰」就成為熱門話題。中國如何開啓與台南養殖漁業的合作？誰又是牽線人？從簽約到交易如何運作？最後誰得利了？對學甲虱目魚養殖帶來了什麼影響？本次（2020 年）的師生田野參訪，到了台南七股去訪問當地漁民，一探中國因素背後運作的過程。

台南虱目魚養殖業概況

台南市虱目魚養殖面積約 4,980 公頃，產量約 2 萬 4 千噸佔全臺第一，年產值約 17 億，主要分布於七股區、安南區、北門區、學甲區及將軍區。通路則大多是外銷及生鮮銷售。據統計，106 年度

全台虱目魚共外銷 8,780 公噸，主要出口國為沙烏地阿拉伯、美國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另台灣的學甲食品公司與中國的公司合作，自 100 年到 104 年與學甲地區業者進行虱目魚契作，104 年保證價格為 40 元／台斤，共收購 2160 公噸；相對於台南市當年約 3 萬 3,261 公噸產量，約佔 6.5%。

契作的開端

這次由產銷班班長金先生，跟我們做介紹。金先生所屬的虱目魚協會有三十幾個會員，養殖面積有四百多甲。金先生表示，中國大部分透過國民黨體系來接觸養殖戶，例如文傳會之類；他們安排參訪漁塢，跟漁民直接互動，了解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但成效評價兩極，許多漁民認為看不出他們是否真心想幫忙，有人說只是做做樣子而已，也有人很幸運的受到幫忙。

中國方面，對台經營虱目魚契作主要是由國台辦體系負責，並與台灣學甲食品公司的王文宗合作，再由時任台南市議長李全教協助與漁民牽線，還有一位姓蔡外號志明，作為中間協助人，促成了兩岸之間的商業合作。

契作政策五年為一期，起初，中國給台南虱目魚的契作價格是一斤 45 元，但價格並非統一。實際價格與漁民簽約的時間點有關，從 42 到 45 元都有，但當時虱目魚的市場價格大約 38 元，因此契作合約價格對漁民來說相對優渥，自然會有人願意簽。相對地，當時合作的政治因素大於商業利益，中間商只管虱目魚契作有沒有達到中國政府預計的量，並不在乎品質、一尾的大小，以及



本次前往參訪的虱目魚魚塢



金先生分享養殖虱目魚的經驗

處理物流及冷凍保存過程的嚴謹程度。

收購與銷售過程

契作一開始訂單量很大，因為中國政府有補貼冷凍廠，且訂單沒有要求購買品項，只要與虱目魚相關，魚肚、魚丸都可以。不過據報導指出：「每年契作量兩千多噸，但這五年輸中數量都遠低於兩千噸，2015 年更僅有十九噸；有業者指出，中國契作的虱目魚以低價回賣台灣，恐衝擊國內市場。」可見中國的消費者，對於台灣虱目魚接受度並不高。

金先生舉例，曾有一批魚肚放在上海冷凍廠半年，後來當舉辦發表會，大家試吃時卻發現都壞掉了，也沒有追究是運送還是儲藏的問題。由於契作靠政治的力量來推動，收購商不管大小、品質，或有味道、刺比較多的虱目魚，都弄到中國去，台灣雖然有幾次賺錢，但是長期而言，失敗經驗使得簽約機會越來越少。

契作對台南的影響與轉變

金先生提到，外銷的好處是，通常會一次抓

光魚塢的魚，不會像內銷分批次抓，驚擾到池子的魚，還讓底層泥土混到水中，導致後續魚的品質下降。且與中國契作的好處還有，當台灣本地價格有所變動時，中國契作價格會成為一個重要參考價，降低波動的幅度，甚至具有保底的作用。

起初，契作合約規範鬆散，當本地市場價格比契作價格高，有些漁民會毀約，聲稱魚死光因此無法出貨，中國那邊就不追究了。後來，每年簽約的量與價格都逐年下降，且合約規範變嚴格，規定漁民不能隨便毀約，一定要賣出簽約的量，否則需要賠償違約金。不過，到了2016年，契作就終止了，傳聞王文宗工廠登記出問題，另外一種說法是合約沒有簽成，中國認賠殺出，停止與台灣契作。

金先生認為，契作本身有利於漁民，但因為中間協調者不適任，導致後來中國進口商虧錢，中國政府的「上級」便不好意思繼續推，再加上時任中台辦、國台辦常務副主任的鄭立中（任期為2006年7月至2013年10月）下台之後，新上任的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任期為2013年3月至2018年3月），又對於契作興致缺缺，使得契作最終失敗。

台南虱目魚的外銷問題

台灣虱目魚大部分以內銷市場為主。虱目魚屬於全球性魚類，若對比菲律賓或印尼，台灣虱目魚的價格偏高，較不具有市場競爭力，外銷無法幫漁民賺取合理利潤。再加上漁民很少直接聯絡貿易商或外銷通路，在外銷市場議價空間不大，主要由魚販和冷凍廠業者決定。

舉例來說，高雄最大的冷凍廠「超發」，每年就負責五百噸到一千兩百噸的量，大部分是外銷往沙烏地阿拉伯跟前蘇聯地區，而超發在今年（2020年）開春的時候，訂出了32元的價格，就成為整年外銷通路的收購價，並非按照市場機制。

金先生表示，虱目魚養殖成本差不多35元，除非魚塢完全屬於自己的，或有其他因素可以降低成本，才可能低於32元。所以通常願意選擇外銷的漁民，魚塢可能還會再寄養蝦，來增加一些收入。

但當遇到商品滯銷時，或外銷不順利，為了不讓虱目魚壞掉，漁民也只能委託魚販，低價把魚再賣回給冷凍廠，魚販會以20元收購，再以32元賣給外銷冷凍廠，賺取中間價差。對漁民來說，價格就從市場價的40元跌至20元，但也只能認賠賣出。

契作經驗帶給台灣什麼啟示

中國的市場很大，但兩邊的漁業貿易，不是取決於市場，而是兩邊對立或友好，不管什麼產品，都要看當時友好程度才能推動。此外，中間商也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要是找錯合作對象，賺了一些政治財，卻傷害了台灣品牌，導致後續失去更多合作機會，對漁民或是台灣都是一種傷害。

契作也並非都沒缺點，當交易出現問題或糾紛，沒有漁會或政府可以幫忙協調。常常在談判的時候，有黑道的介入，有時候槍就放在桌子上，金先生表示：「牽涉到這個很討厭，生活都會不快樂，地痞流氓最好都不要認識。」

虱目魚產業的危機

就產業發展的角度而言，台灣虱目魚業還遇到了兩大問題，一是人力資源不足、二是缺水缺電。當前的養殖漁業都需要倚靠大量的人力，不管是在捕撈還是後續的加工，漁業的機械化程度遠低於農業，而因為少子化問題，台灣又時常面臨缺工問題，導致養殖成本高升。在國際自由貿易、技術流通的環境下，虱目魚養殖產業越來越不具有優勢。此外，接班也成了大問題，許多漁民年紀偏高，是否有年輕人願意回來經營，成了迫切的問題。

目前，養殖漁業主要仰賴外籍配偶以及外籍移工，尤其在加工的部分。由於消費者喜歡去刺的虱目魚，而去刺基本上都是以人工的方式。早期一尾去刺的工錢是20到25元，但在市場需求上升，勞動力供給減少下，現在一尾去刺的工錢需要到45元；再加上虱目魚的養殖、運銷成本，一尾去刺虱目魚賣到消費者手上，可能高達200元左右。

第二個問題：缺水缺電。在台灣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下，南科每年的用水用電量逐年上升。政府為了維持科學園區的穩定供水供電，自然會排擠到農、漁業的用水用電。但養殖漁業最需要的兩個資源，就是水與電，每天二十四小時運作的水車，才能維持魚與蝦所需的氧氣，當這兩個自然資源無法穩定供應時，養殖漁業恐難以維生。

虱目魚產業的契機與轉機

金先生強調，如果要真正促進虱目魚產業，台灣應該發展產品的差異化，還有精緻化。他說，現在的人吃東西不怕貴，就像日本和牛一樣，分成不同的等級，就能大大提升其價值。首先，就差異化的部分，虱目魚需有商品等級區隔，可以從味道、養殖環境、加工包裝過程下手，並從飼料進行改良，讓魚吃起來有牛奶香氣；如果能做出特殊品牌，價格將會更好。

再者，就產品精緻化的理由，他認為，現在人吃東西怕麻煩，如果有很多魚刺，消費者可能



清大教師與受訪者合影留念

就不想買了。未來可以發展虱目魚丁，切成六寸大小，可以保持虱目魚香氣，又能避開骨頭部分，即便有一些細刺，也因為很軟而可以直接吃下肚。雖然發展新的東西，剛開始會辛苦一點，但推出來之後，大家可能會搶著要買，可以為漁民帶來直接的收入，也能繼續維持台灣養殖漁業競爭力。

此外，隨著政府大力發展綠色能源，從綠地到水面都成為太陽能發電的場所，尤其南部日照充足，更是太陽能發電的理想地點。「魚電共生」成為政府發展的重要目標，許多魚塢已佈上太陽能發電板，可以為漁民帶來額外的收入，又能增加綠電占比，可以說是雙贏。但也有一些顧慮，例如，太陽能板會不會污染魚塢，商業損失與環境損失該由誰負責？以及隨著魚塢附加價值提高，

魚塢租戶恐需負擔更多租賃成本，目前很多魚塢一年一公頃土地租金漲到 40 萬。對漁民是好是壞，仍有待時間去證明。

綜上所述，虱目魚產業牽扯到各領域的議題，也存在許多不穩定因素：過程中加入魚電共生，是否會造成環境污染；捕撈與加工過程的缺工危機；後續冷鏈廠商的寡占造成失場失靈；銷售利益分配過程中，漁民可能處於弱勢。這些都是產業發展需要去思考的問題，契作僅僅只是其中一個環節，雖然對維持產業穩定有一定的貢獻，但如果台灣虱目魚養殖想要長遠的成長，找到產業升級與環境保育取得平衡等永續發展的機制就相當重要。

—師生田野紀要—

從一個社造團隊看台灣青年回流政策

楊士學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青年回流行不行？

我國自工業化以來，許多農村青年因為農耕技術的改良而從農業勞動中釋放出來，且因為工業化的都市需要大量勞動人口，便紛紛前往都市謀生，導致農村人口不斷外流，引發台灣的都市化。隨著社會變遷，因都市化的人口移動所造成的許多社會問題一一浮現，如農村勞動力的老化、少子化造成的農村凋敝，以及社會資源分配不均造成的城鄉差距等。為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政府便開始計畫性地制定相關政策吸引青年返鄉，如2006年農委會的「漂鳥計畫」、2008年的農村「再生計畫」、2011年水保局的「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2012年行政院青輔會的「青年社區參與行動」，一直到2017年教育部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去年（2019）行政院開始的「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等等。這些計畫實際的效用及影響為何？真的能夠達到青年人口回流的目標嗎？或許我們可以從這次的田野對象——穀笠合作社的創辦人之一吳宗澤身上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

埔里籃城社區——好山好水的純樸農村

這次的田野地點在南投縣埔里鎮的一個小社區——籃城里。埔里鎮位於埔里盆地內，是台灣地理位置的中心點，由中央山脈、雪山山脈大橫屏支脈，以及合歡山白姑支脈所包圍，四面環山，市中心海拔達440公尺，全境氣候舒適宜人，生態物種相當豐富，也是台灣著名的觀光小鎮。而

境內有南港溪、眉溪等高山水源流經，土壤肥沃，此地種植的農作物如茭白筍、百香果等亦聞名全國。而位於埔里中心位置的籃城社區，其舊名稱「林仔城」（閩南語），因早期開墾時，為防範外敵入侵，社區周邊遍植刺竹而得名。社區的主要經濟活動為農業，主要種植紅甘蔗、茭白筍、玉米、五葉松、花卉等經濟作物。



清大師生前往南投縣籃城社區拜訪

龐大的觀光效益仍然留不住年輕人

儘管南投因為日月潭、清境農場、集集車站等知名觀光旅遊景點吸引許多遊客造訪而得益，但卻仍然無法阻擋青年人口大量外移的洪流。直至今日，埔里鎮的人口依然不斷流失，是全國人口外移最嚴重的鄉鎮之一。籃城社區人口僅一千餘人，七十歲以上的高齡人口比例佔一成多，作

為當地主要經濟活動的農業因而面臨勞動力不足及老化的問題，社區機能逐漸衰弱，而用以維繫社會情感、建立地方認同的在地歷史文化記憶也逐漸消失當中。

一瓶埔里好水的代價 ——「多喝水事件」始末

或許我們都知道「多喝水」的礦泉水源來自埔里，但卻很少人知道這一瓶礦泉水的背後實際上涉及相當多的爭議。其中一項曾經引起輿論廣大關注的爭議發生於 2012 年底，當時南投縣政府為招商引資，意圖收回縣有土地承租給味丹的「多喝水」擴廠，最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早已在該土地上頭耕作數十年的幾位農民，其中更包括曾協助吳寶春以「荔枝玫瑰」麵包獲得世界麵包大賽冠軍的「玫瑰四度」有機玫瑰園。而根據〈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此地屬於「國有農牧用地」，農民本就擁有優先承租權，但南投縣政府為了爭取味丹公司的設廠投資，透過法令鬆綁、片面修改與農民之間的耕地租約，協助財團取得擴廠用地，棄農民的生存權益而不顧，選擇協助高污染產業而非原先以友善耕作的方式在此發展的農民。在各種資源的匱乏下，面對政府傾向企業利益的作為，本就無力與資本家對抗的農民在此時就顯得更加無力。

然而，此時開始有一群人關注這一事件，那就是暨南大學的學生，他們不僅聲援這些受到壓迫的農民，更將聲量化作實際行動，成立「內埔農業後援會」，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了解土地爭議的問題，並舉辦各式分享會，試圖吸引更多人的關注，最後也成功引起輿論迴響，味丹公司最終決定順應輿論要求，終止埔里擴廠案。

社會運動後持續深耕地方的都市青年

這群學生沒有因為社會運動告一段落而離開社區，反而是選擇繼續留在地方上生活，在 2014 年時成立「穀笠合作社」及「籃田好生活」，為地方的產業發展及文化保存盡一份心力，也期許

能夠作為橋樑，讓更多年輕人願意回到地方上「好好生活」。起初幾個人一起租了一塊田地，捲起褲管下田種稻，全程不使用農藥，堅持有機的方式，為地方的友善耕作「種」下起點。此外，他們也推廣「放伴」的合作方式，也就是在農忙時節，與其他農民彼此幫忙採收農作，除了能夠解決彼此在採收季節「缺工」的問題，也讓他們在這過程當中，與地方逐漸建立關係。他們也向各個學校及社區進行食農教育的推廣，以期能讓更多年輕人願意了解農業，甚至進一步返鄉或移居農村。

此外，他們也透過各種藝術行動、公共空間的營造，找回地方居民的集體記憶，重塑居民對地方的認同感。例如他們在去年（2019）採訪社區長輩早年過冬至節日的生活記憶，透過戲劇《冬至圓》的方式重新呈現，除了重新喚起社區居民對於傳統生活的回憶，也幫助來到現場的在地年輕人及外地人，認識冬至的文化意義。還有，他們也在社區舉辦相片展，以籃城社區作為展廳，以社區的舊照片作為展品，充分利用社區紋理，為地方帶來一次既新鮮卻又熟悉的文化饗宴。更為特別的是籃城的「武術文化」，起初是用於抵禦外來者的入侵，在沒有防禦需求以後，被社區居民用作強身健體，但是隨著年輕一輩逐漸離開籃城以後，這項文化也慢慢的消失，而在穀笠合作社的青年們主動和社區長輩學習以後，這項武術文化才得以延續下去。



吳宗澤先生分享經營社區的在地經驗

總而言之，這群年輕人抱持著在鄉村「好好生活」的理想，透過各種方式與社區建立關係，也重塑地方居民的認同感與光榮感，並且以自身做起，讓更多的年輕人願意回到農村發展，而他們也在這社區營造的過程當中，從外地人慢慢的變成了「自己人」。然而，這樣的青年移居/返鄉的成功案例其實相當少數，實際上，目前我國農村人口外流的數量仍遠大於移居/返鄉的數量，埔里鎮也不例外。這也不禁令筆者好奇，政府多年來投注相當多的經費及心力在農村上，為何仍看不見大量青年回流農村？

青年回流農村大不易

我們在聽了穀笠合作社創辦人之一的吳宗澤先生分享後，才深知在農村發展的不易。在與地方毫無連帶關係的情況之下，必須透過各式各樣的行動與社區發展關係，而這過程往往相當艱辛，但是也必須透過這樣的辛苦過程，才有辦法真正融入當地，成為「在地人」。而他們想要「好好生活」的理想也必須倚靠現實的支撐，也就是他們的經濟來源該如何取得？這個問題不僅是吳宗澤需要解決的問題，更是所有移居及返鄉青年需要面對的難題。

我們常常在媒體上看到許多因為從農而「年收百萬」的返鄉青年，卻忽略了因無法維持生計而黯然離去的返鄉青年才是多數。由此可見，返鄉從農並非易事。就如同吳宗澤所講：「當你下去種的時候，你就知道（農民）為什麼不要種有機的啊，你蟲要自己除，你草要自己割，你福壽螺要自己抓」。推行有機農法首先面臨到的就是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耗時耗工且靠天吃飯的生活，往往讓許多有意從事友善耕作的人望之卻步。此外，吳宗澤也提到：「這些人習慣的方式是以往那種行口、拍賣市場，或者是有既定的通路，他們在追求的也是消費者喜歡的，价格便宜、漂亮、大、CP值高，餐廳還會追求的是規格化」。儘管人們都認知到有機無毒的農產品才是健康的，但大多數消費者在購買農產品時，依舊以「價格」做主要考量，這也使得充滿理想的青農在實際面

對到市場現況時，便難以招架。

從吳宗澤的訪談中可以得知，他與他的夥伴通常不只有一種收入來源，他們必須要透過各種方式賺取收入，才有辦法繼續支撐他們在社區當中的工作與生活。儘管他們在進駐初期有獲得教育部「青年行動社區參與計畫」的經費支持，但這僅僅是移居農村的第一步，後續的道路比初期更加艱難，這也往往讓很多移居農村或返鄉從事社區營造及友善耕作的年輕人卻步。



吳宗澤先生向清大師生進行社區導覽

由於返鄉的高成本，使得多數青年寧可留在都市也不願到農村打拼，不管政府再怎麼努力透過各種返鄉補貼政策鼓勵青年移居或返鄉，其成效往往無法符合預期。如同吳宗澤和他的夥伴的成功案例是少之又少，甚至也有許多移居/返鄉青年因種種不利的環境因素導致他們又再次離開農村。該如何讓青年人口成功回流？看來政府的各式補助並非唯一解方。從吳宗澤等人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好好生活的「初衷」是他們持續留在農村的主要原因，因為保有這份初衷，使他們在地方上行動時，得以維繫著初入農村的熱情與理想。而「多元收入」是他們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探索出來的一條可行的生存道路，因為有著各種收入，使他們在現今返鄉／移居不易的環境之下，仍能為地方注入活水，同時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

—師生田野紀要—

全球供應鏈重整 ——野寶企業的未來發展

葉潤泰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近年中國經濟和產業發展是世界的焦點，「中國製造 2025」引起了世界對中國產業轉型和發展的關注。中美貿易戰爭議如火如荼，不少在中國設廠的外資企業都無可避免受到增加關稅的影響；此外，2020 年初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為各國的供應鏈增添諸多不穩定的因素。因應上述局勢，台灣政府祭出補貼，希望在貿易戰和疫情的狀況下吸引台資企業回流台灣。以上各種狀況都牽涉到跨國企業的供應鏈政策與海外廠房的佈局，台資企業在這波供應鏈重組的思考中亦沒有例外，這次參訪對象野寶集團也是其中之一。製造高檔單車及其零部件的野寶集團，原來早在 5 年前早已感受到「紅色供應鏈」的劇烈競爭，因此打算將廠房搬離中國，謀求在世界工廠以外尋找新的落腳點。野寶集團的經驗或許進一步揭示了未來台資企業在中國「騰籠換鳥」政策、「紅色供應鏈」和中美貿易戰的等局勢影響下，如何適應環境的轉變並尋找出路。

野寶集團簡介

根據野寶集團網頁、報導和公司簡介，野寶集團創立於 1985 年，於 1993 年進入中國大陸。集團生產項目包含車架、碳纖維輪圈、輪組和避震器等產品，也有跨足電動輪椅等領域，旗下自有品牌為 Taokas、X-Fusion 和 Ori 等，全體員工 2,000 人。在全球共有台灣、昆山、深圳、越南等 4 座生產基地，整體年產能可達 100 萬台。不同的生產基地各有職責，台灣廠生產碳纖維車架、鋁合金車架、碳纖維輪圈等產品，以及組裝輪組和

少量折疊車，以中高端產品為主。深圳廠在 2000 年成立，角色與台灣相近，不過生產數量較多，其中 50% 為電動自行車。崑山廠於 2001 年成立，目前主要與瑞典公司合作生產客製化電動輪椅。越南廠於 2018 年啟用，整體面積 76,000 平方米，規劃 6 棟生產廠房，包含鋁合金廠、碳纖維廠和烤漆廠。預估 2019 年年產量達到 20 萬台。2019 年的營業額達 1.3 億美元，當中歐洲的銷售佔 70%、北美的銷售則佔 25%。野寶企業未來產能的配比規劃方面，從現時總產能八成在中國，兩成在台灣，預計將調整成中國下降為兩成，台灣提高到三成，其他的五成則放在越南廠。

我們這次參訪的地點位於台中市大甲區的野寶頂店廠，2017 年由野寶舊廠房原址重建而成。整個總部不單有辦公室，還有單車零部件的製造部門，例如單車前叉、後避震和避震座桿，以及這些零件的裝配和檢驗工場。野寶集團的執行長李有義先生首先向我們簡介自行車產業的現況。他指出全球每年生產 1 億台自行車，當中 3 千萬台是專業型的自行車，而台商佔了專業型自行車生產量的 80-90%，因此台商在這個業界有非常高的話語權。

李先生指出這 30 年間自行車產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在剛入行的時候，自行車只是代步工具，後來發展出不同車款，例如公路車、BMX 小型車和全地型車等等，而這些車種的市場需求對台灣的自行車產業有很大幫助，也讓野寶集團賺到第一桶金。接著副理王貫宇先生介紹野寶集團的研發業務，他指出集團投入了很多資源作各種研發工作。例如在金屬材質方面，野寶自行研發



清大師生至台中野寶集團進行拜訪交流

出多項可以應用於自行車的材料，例如鋁合金、鉻鉬鋼、鈦合金、碳纖維等材料，是在業界唯一有多材質生產經驗的廠商。另外，王副理亦提及公司未來會繼續走向中高階車種發展和自動化生產，他認為集團不能一直做價格競爭，不可取代性是未來衡量價值的基礎，因此需要掌握關鍵技術才可以保持公司利潤。

為什麼離開中國？

聽完李執行長和王副理介紹野寶集團的經營情況，感覺上集團發展在各方面都很順利。隨後我們針對未來產能調整的規劃，不禁好奇而提問：野寶集團為什麼決定要把供應鏈撤離中國呢？執行長認為在中國廠商「紅色供應鏈」劇烈競爭下，野寶難以繼續在中國生產。首先，中國廠商受惠於地方政府的補貼，與外資進行競爭。執行長指出，對外資企業而言，2、3 年沒有營利就已經要倒閉了，可是本地廠商在政府補貼下的生命週期可以很長，甚至可以跟野寶競爭二、三十年。另外，本地企業可以憑恃補貼的優勢，先擴大生產規模再追求營利，野寶則只能夠先有營利再擴大規模，對外資而言中國廠商的殺傷力很大。

第二，在中國設廠難免面對抄襲的問題。野寶非常著重智慧財產權，也很重視培養自己的員工，希望透過一步一腳印來建立集團的事業，包

括材料研發的工作。可是中國有很多企業從事仿冒和複製，並喜歡花錢買專利，以這種複製的速度而言倒是很有競爭力。除了抄襲和直接購買專利，人才挖角也是重要的因素。執行長以在 90 年代到中國設廠作比喻：「中國現在有三萬家鋁合金車架公司，當中 50%都是我們公司的人出去！」，並指出野寶無法與本地廠商一同競爭人才，他們所給付的薪資與本地廠商一樣，可是前者是台幣，後者是人民幣。李執行長更形容本地廠商

「背後有一群富爸爸來支持他們做這件事」。由此可見，生產技術容易被作為競爭對手的中國企業以各種形式抄走，這些技術甚至成為了「紅色供應鏈」其中一環。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產業政策的改變也是野寶生產線離開中國的原因之一。中國政府提出「騰籠換鳥」政策，希望把勞力密集產業往內地遷移。李執行長舉了江蘇昆山廠房的例子，江蘇昆山在 2014 年發生了一起嚴重的工業意外，中榮金屬製品的汽車輪轂拋光車間發生粉塵爆炸，導致了 75 人死亡。由於野寶在昆山的廠房同樣涉及鋁合金車架的拋光工序，地方政府要求野寶停產。在事件發生後三年內，野寶進行了各項改善工廠的工程，當局始終沒有讓工廠復產。可是執行長觀察到，昆山其他本地廠商都已經復工了，他認為這意味著當地政府可能不再歡迎外資在昆山設廠。

在中美貿易戰下，野寶也是受影響的一員。午餐時李執行長在席間透露，野寶從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都要加徵關稅。由於美國「301 條款」下，車架的生產地幾乎被視為該自行車的生產地，因此車架都要從其他地方出貨，包括越南和台灣。這也呼應了執行長在對談的回應，中美貿易戰的出現只會加快野寶集團離開中國的速度。對野寶而言，到越南設廠就沒有以上的缺點，而且越南也跟愈來愈多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也是為什麼野寶會將生產比重調整成以越南為主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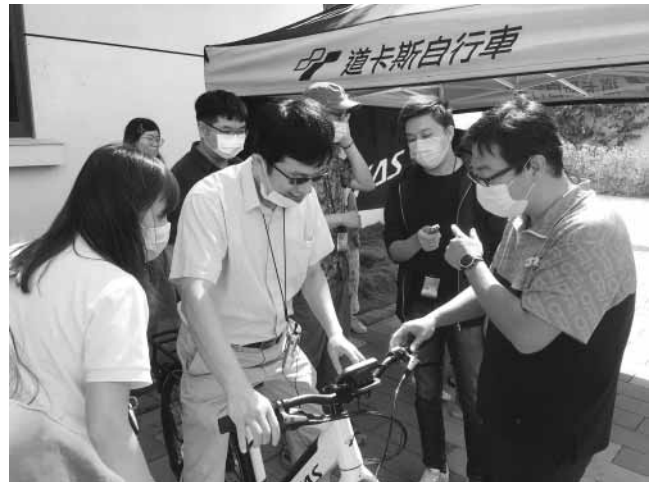
即使已有產能調整規劃，但要將工廠從中國遷移到越南也非易事，執行長表示需要解決員工和用地方面的問題。搬遷的第一個步驟是關閉集團在中國的廠房和解散當地的員工。集團需要提供比法規優厚的條件去解散員工。在土地方面，集團需要將土地轉手出去，可是當地政府不會接手集團的土地，接手的是大型的地產商、央企或國企等代為收購土地的中間人，而且野寶集團只能用以土地市價的 25%到 33%來脫手。不僅如此，更要考慮如何吸引優秀的陸幹到越南工作。

中國台商的未來何去何從？

李執行長認為每個產業發展大概每 20-30 年就會面對產業環境的改變，進而創造產業遷移的歷史背景和條件。自行車產業從日本遷移到在台灣至今大概已有 50 年歷史，中間遭逢產業變遷和轉型挑戰時，剛好遇上中國改革開放，因此透過產業遷移延續了台商自行車產業的生命。

他進一步向我們分析了中國台商未來的挑戰，他認為這些從事外銷工作並受「紅色產業鏈」威脅的台商，可能會考慮外移，可是這些台商若要從中國外移會面對很多挑戰，而且不見得都具有跨國經營的能力。以往很多台商以為自己有跨國經營的能力，實際上則必須有能力處理語言不通的問題才能跨國經營。如果台商把生產線搬去中國時就結束了台灣的所有業務，或者在台灣只做倉儲、財務等項目，就更難外移。一旦這些台商無法外移，就要面對被取代的風險；如果針對本地市場的台商，未來十年將會面對部件的通路問題：必須要打通各地地方政府掌控的環節。

台商除了打算外移外，也可能考慮回流台灣。李執行長認為台商回台的現象可以分為兩個類型，一是本來在台灣已經沒有業務的台商，二是那些在台灣有設立總部的台商。前者會發現自己的業務都在中國，面臨產業鏈重整時會回來台灣設立總部。後者則會擴大台灣總部的規模和功能，因為總部在海外開闢生產線時不能只講管理，而是需要有技術人員和懂得實務的人來協助工廠運作，因此可能需要加上研發功能和少量量產的



受訪者介紹野寶集團的新產品

生產線，儲存外派的能量。

在面對工業 4.0 逐漸講求以大規模生產的售價來製造客製化產品，以及「紅色供應鏈」講求中國國內自給自足生產體系的情況下，供應鏈重組成為了台商的難題。從野寶集團的經驗分享中，我們觀察到台商在中國「紅色供應鏈」政策下，成為了被排擠的對象。台商亦需面對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來轉移產能過程中的各種問題，中美貿易戰更加重了供應鏈重組的迫切性。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以野寶的自行車產業為例，產業向上升級使得公司的利潤並未受經濟和國際環境大幅影響，反而獲得不錯的利潤。紅色供應鏈的興起同時也促使台商考慮回流的可行性，有助於增加投資本地的金額和創造就業職位。整體而言，全球供應鏈的重整同時為台商帶來危機和機遇，讓他們重新思考未來的發展策略。

—師生田野紀要—

精準扶貧誰得利？ ——從台一農場在貴州畢節之經營初探中國扶貧政策落實

丁德維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所謂「精準扶貧」，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 2013 年 11 月，在湖南湘西花垣縣十八洞村考察時提出，主要內容有三：

- 一、精準化理念是精準扶貧思想的核心要義；
- 二、分批分類理念是精準扶貧思想的基礎工具；
- 三、精神脫貧理念是精準扶貧思想的戰略重點，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

數量龐大的務農人口因而成為中國政府攻堅脫貧之主要目標，其每年所發佈之一號文件亦均以關注農業成長、實施全面小康生活為發展計畫。此次所參訪之「台一農場」，該家農場於 2013 年進軍中國貴州，並於畢節市另設台金農場，透過農地「流轉」的方式設立「生態觀光農業科技園」，將農民原有的畸零地予以統合；台金農場每年再給予農民一畝地 1000 塊人民幣的費用，並邀請農友進入園區工作、學技術，除了生產農產品，還有各類「深加工」，並規劃台灣小吃街、花餐等特色區塊。

2020 年適逢台灣總統大選，許多與中國因素有關之討論捲土重來，台商的去留與否亦受到強烈關注。不僅中國政府在觀望，台灣市場也處於「小心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對於台商而言，中國的廣大市場是塊難以捨棄的大餅，若台商前往中國開設工廠、設立企業，雖能得到來自當地政府的經濟補助、政策優惠，但必然也會遇到需配合地方政府政策之狀況。如此次所參訪的台一農場，其在貴州畢節市設立了台金農場，配合當地扶貧政策，就種苗等業務為當地培養及輸送人才。從董事長張國禎、總經理莊瑞麟在貴州畢節

市之經營方式自述，或可一窺中國所謂精準扶貧政策之落實情形。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簡介

台一休閒農場創設於民國八十五年，位於南投埔里，董事長張國禎出身於台大農業試驗所，其成立宗旨乃「提供知性觀光資源」，於業內以將花卉用於食衣住行育樂等著稱，將精緻農業與觀光資源結合，標榜要打造之「生產、生態、生活、生命科學」氛圍，而亦是該精緻農業風格，吸引貴州畢節政府據此招商引資，期待改善當地農民生活境況。



清大師生前往南投台一農場拜訪

投資伊始：貴州畢節市台金農場

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屬於地級市的貴州至今發展卻仍被其它城市遠遠拋在後頭。2012 年貴州全省貧困人口 923 萬人，2015 年底貴州省有 9000 個貧困村、493 萬貧困人口，貧困人口數量排全國第一位。莊瑞麟總經理在董事長張國禎指派下，前往貴州畢節市進行投資，並設立台金農場，根據本次莊總經理對貴州扶貧經驗之口述，我們或可一窺中國扶貧政策的虛實。

扶什麼貧、受眾是誰？

莊總經理在貴州台金農場主要負責業務接洽與人力派遣等工作，並安排當地官員與農民前往臺灣台一農場進行參訪及技術之深度學習。據其表示，雖然中國政府誓言欲透過產業移轉、異地搬遷等方式消滅扶貧戶，粗估能於 2020 年完成全面脫貧「摘帽」，然而這美好願景僅代表中央政府一廂情願之規劃，地方政府負責搖旗吶喊卻少有實際行動。他認為原因有下列數點：

- 一、地方政府拿中央的錢撒胡椒粉，即貴州該地之脫貧欲以傳統農業轉型新興農業為目標，但地方政府卻無精準政策規劃，甚而不了解農業實際運作情況，導致錢永遠無法花在刀口上，成效是否得頌揚亦需再評估；
- 二、扶貧戶推算數據不準確，所謂「扶貧戶」由於能得到異地搬遷的資格與資源補助，故而評判「貧戶」之事亦可靠政治上的裙帶關係，這導致對貧困人口推估難以精確，補助就難以真正到位；
- 三、官員更在意自身官位升遷。由於扶貧專案能帶給地方政府大量來自中央的財政金援，故而地方官員通常另闢蹊徑，欲以該補助來謀求檯面上更容易可見的發展，而非將大量資源投入於需長期投資的農業項目中。莊瑞麟總經理表示，雖現代化知識衝擊貴州畢節，使大家都想改變，然該體制使其難以改變。

臺灣人無法插手的痛？

據莊總經理所述，當初貴州畢節市邀請台一農場前往該地設廠時，事先就臺灣農業發展情況為綜合評估，詳細了解臺灣人力資源與產業資訊。雖臺灣近年開始發展精緻農業，然規模卻遠不能及中國；另方面，資金也不再是中國方看重的誘因，台商過往的優勢不再。他認為，中國之所以仍選擇臺人前往設廠之因，乃認為臺灣保存良好中國文化，故還是會找臺灣人招商引資，並更強調台灣在技術層面能帶來的幫助，因此常前往台商聚集地如東莞、昆山、廣州尋找專業技術型人才。

實際上，在貴州發展現代農業並不容易。正如前面所述，地方官員需要立竿見影的面子工程，投資大、規模要更大，以期高成效與好結果能為政績添上亮麗一筆，但農業發展並非立竿見影，需長時間方可開花結果。而且，在中國做大型現代農業都是政府投資，臺灣負責技術指導，實際上臺人能參與的項目並不多，掌控範圍亦相當有限。換言之，由於臺人投資規模小，導致握有話語權並不容易，以台金農場為例，即是中國企業負責基礎建設與投資，臺灣技術入股，且提供專業技術人員協助發展。

中國與臺灣農業發展之比較

訪談最後提到中國與臺灣農業情況與地方政府幫扶情形的發展比較。莊總經理認為，在地方治理網絡中，臺灣得益於中央給予地方政府相當大的權力，強大的地方自治力量讓民間得以有許多發揮空間，得充分展現地方自治精神；再加上臺灣基層獨有的鄉鎮機關及農會，早已發展為政府的雙手雙腳，是地方治理的基石。中國相較而言，缺少該地方治理網絡，因其為一黨專政，強調命令垂直貫徹，雖效率高但人為因素很大，地方政府幾乎都坐等中央領到發號施令，與臺灣相較更多地缺乏自主性。

就台金農場於貴州畢節市之發展情況，董事長張國禎表示中國在政治變化方面，從省到縣有

很大落差，不僅詞彙用意不同、語彙也不同，在當地經營農場時，在想法溝通或解釋上都可能面臨很大問題。中國官員時常想法一日三變，對於農業需要的發展過程缺乏認識，只希望成果盡快落成。由於農業發展作為中國官方實現「脫貧政策」的重要途徑，故而地方政府都會派領導視察參觀，並召開會議；貴州畢節的地方政府不僅希望台金農場輸送臺灣人才到貴州，也要求基層官員來臺灣視察，期望回去後能逐步將觀念更動。張董事長因對於兩岸農業發展都相當了解且頗有建樹，故被任命為貴州農委顧問，其認為當地政府亦是盡力提供條件、給予官方協助，期待能打破觀念落差，專心使貴州自傳統農業向現代精緻農業看齊。

結論

截至 2020 年 11 月，貴州宣布正式脫貧「摘

帽」。雖中共政府強調習近平所提出之「脫貧攻堅」與以往「定向扶貧」不同：所謂定向扶貧，即直接鎖定貧困村戶並給予經濟援助，此舉難以根絕貧困，取而代之的脫貧攻堅指的則是發展特色產業，使貧困戶能因此有相對穩定之收入。然而，隨疫情蔓延，不少產業停擺，使該初見雛形之特色產業陷入困境，也許，接下來共產黨關注之目標，應在於如何阻止脫貧人口返貧。

如同上文莊總經理所述，與臺灣相較，中國由於強調命令垂直貫徹，故若該特色產業能獲得中央支持，地方政府亦願意給予極大的土地、水源、政策便利等扶助。即便地方政府可能因為浮濫產業，使政策顯得無力，然而在產業發展初期，政策優惠帶來的發展經驗仍然相當可貴。

「精準扶貧誰得利？」綜上文所述，扶貧政策的最大得利者仍可能是地方政府與官員。扶貧看似發展斐然，不過閃閃發光的泡泡罷了。



清大師生與受訪者合影留念

—師生田野紀要—

兩岸的和平女神： 媽祖信仰與兩岸交流帶來的認同矛盾

游佩宣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根據大甲鎮瀾宮在自身官網上提供的簡介，相傳現今坐鎮在鎮瀾宮的媽祖，最初是來自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島某位信士，向湄洲媽祖祖廟分靈來台供奉。其遷移路徑，由大安港至大甲堡，最後由信眾們徵得該信士同意後，這位渡海來台的媽祖便由原先私人供奉的神明，轉為地方仕紳建祠後的天后宮主神。爾後，在屢屢重建及擴大廟宇的過程中，取自媽祖鎮海安瀾的形象與涵義而來，而將天后宮更名為「鎮瀾」宮。

由大甲鎮瀾宮主責籌組的台灣媽祖聯誼會，成立於民國九十年。同時也是全台第一個合法立案的全國性媽祖社團，根據官網的敘述，其核心理念圍繞在媽祖信仰下，包括了經濟、地方、組織、文化以及神聖性等不同面向。而全台各地，共有四十座媽祖宮廟為聯誼會會員，共同實踐「啟動媽祖經濟產業」、「建構媽祖人文景觀」、

「促進媽祖信眾交流」、「推動媽祖文化傳承」、「弘揚媽祖慈悲精神」等理念。透過與談人鄭銘坤，現任鎮瀾宮董監事團隊副董事長、媽祖聯誼會會長的描述，我們可以得知聯誼會的會員必須以宮廟為單位，並且該宮廟的主神必須是媽祖。然而這樣橫跨全台各地的組織，當年成立的契機，卻是源自於一趟福建賢良港之旅。

成立的契機：為媽祖蓋一個新家

據鄭會長所言，當時前往賢良港參觀媽祖故居的經歷中，看見牌樓老舊破損，因而起心動念希望能出錢修繕牌樓。當時鄭會長認為，「我頂多給你台幣兩百萬就夠啦」，而當地也認為這樣的金額非常足夠，然而在這之外，鄭會長也認為，「不是夠的問題啊，我一個人來做沒有意義」，

一群人做比起一個人做更有意義，於是他召集台灣幾個同樣具有媽祖信仰的大宮廟，一起為媽祖故居捐獻修繕基金。然而，就在大夥準備前去參與牌樓落成儀式之際，鄭會長透過與窗口聯繫的過程中，得知當地交通的不完備，因而再次號召捐獻重整柏油路，「每個宮廟又都花一百多萬」，使得事情順利圓滿落幕。也因此，就在一行人自台灣往返賢良港的媽祖故居後，萌生出成立一個媽祖聯誼會的念頭，希望不只是作為此次共同捐獻修繕媽祖故居牌樓與路段的紀念，更能為後續共同推廣媽祖文化的行動立下一個基礎。



清大師生於大甲鎮瀾宮合影留念

在這樣的脈絡之下，鄭會長也談到了媽祖做為台灣的一種民間信仰，大甲鎮瀾宮的職責，除了成立聯誼會推廣媽祖文化外，更肩負著宗教連結社會中的扶貧濟弱功能，因此，大甲鎮瀾宮也在擲筊請示過媽祖後，選擇成立了孤兒院。鄭會長認為，媽祖的靈驗，就在於看見孤兒院背後的新移民社會問題。在會長的論述脈絡之中，其實呼應了台灣身為海島國家而擁有的移民社會特質，而媽祖又因之鎮守海上的神威顯赫，而特別見重於移民社會，因此，當論述者不斷強調著媽祖對信徒的保佑與神威時，或許也在無意中，透露出媽祖信仰與中國大陸之間，隱晦而纏綿的緣分。

兩岸的和平女神：信仰與政治的切割

在媽祖聯誼會的官網上，可以看見組織在重要紀事中，陳列著「修復福建省莆田賢良港媽祖故居」、「舉辦兩岸最大規模之『湄洲謁祖進香』」、「舉辦『2008 台灣媽祖文化論壇』」、「發起兩岸合作申報聯合國『非物質世界遺產代表作』」、「首屆海峽論壇」、「中國全國政協、國台辦、海協會與台灣媽祖聯誼會代表團交流媽祖文化」等關於兩岸媽祖信仰互動交流的記載。

因著個人的成長經驗，曾有不少與外省老兵接觸經驗的鄭會長，也在與談之中不時表露出對戰爭的反感，以及對兩岸和平穩定的追求，更曾說「媽祖是兩岸的和平女神」。儘管宗教信仰確實作為撫慰人心的存在，然而換個角度而言，這樣的說法似乎也提供了避免政治衝突的轉圜餘地，所謂的「兩岸和平」也讓人聯想到中國對於臺灣的「和平統戰」。當媽祖信仰以文化保存之名作為兩岸齊心協力共同守護的目標，那麼所謂的和平之語，也可能會是中國為拉攏在台親中人士的美好說詞。儘管如此，在鄭會長的經驗與認知中，歷史上，「帶入戰爭的帝王，好像後面都不理想」。而對於中國領導人的看法，鄭會長也分享了自身的經驗：「我記得有一次到大陸坐計程車，我就跟他（司機）在聊天。談到毛澤東他就罵，談到鄧小平他就這樣（比讚）：『欸！讓我現在有三台車，我還有兩個房子。』」也因此從

上述的言談中，可以感受到對鄭會長而言，「走入經濟，這個才是真的，讓我們的下一代安全、平安，這才是真正為台灣，為兩岸。因為我們拜媽祖的嘛，我們也要台灣穩定、台灣可以快樂」，在這樣的認知背景下，我們可以理解大甲鎮瀾宮，以及由其所主導的台灣媽祖聯誼會，如何能夠在政治敏感的氛圍下，依然以開放的心態積極的與中國進行宗教上的交流。

然而，就實質層面看來，縱使在官網的重要紀事中提到了「發起兩岸合作申報聯合國『非物質世界遺產代表作』」，事實上，未曾提及的部分，卻是鄭會長在問答環節中分享的辛酸經歷：台灣因為不屬於聯合國的會員國，因此最終這項「媽祖信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被歸屬在中國的文化遺產列表之中。鄭會長更進一步分享，當他到實地去翻閱所謂被認證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媽祖信仰的種種資料時，看見的卻全是當時大甲鎮瀾宮用來申請的文件。儘管鄭會長也舉了韓國將端午節作為申請該國文化遺產的例子，試圖宣洩這種文化遭到冒用的不平心態，但最終，鄭會長依然回到推廣媽祖信仰的立場，認為不管這項文化歸屬在誰的名下，只要能夠被發揚光大，都是好事。然而在聽講的當下，筆者不禁聯想到，中國此番作為，難道不是藉機告訴全世界，所謂「臺灣的媽祖信仰」即屬「中國的媽祖信仰」嗎？換句話說，中國如此彷彿偷天換日般地申請到以「媽祖信仰」為名的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只是為自己在國際上取得了一定的肯定，更是回過頭來讓國際社會變相地肯認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透過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看見在兩岸文化的親近性與熟悉性之中，其實有著更多的政治意涵值得我們深思與探討。

在地化與中國根源的矛盾

在鄭會長的演講之外，筆者亦觀察到當天演講的所在之地——鎮瀾文化大樓，除了在樓層櫥窗中陳列各項媽祖信仰相關的輦轎、法器與儀式用具，在該大樓的一樓入口處，更有著神農、黃帝、周文王、孔子、秦始皇、韓信、諸葛亮、李

世民、岳飛、成吉思汗、鄭成功與林則徐等十二位中國歷史名人塑像，然而這十二位歷史人物與大甲鎮瀾宮的關聯為何？何以在眾多歷史名人中挑選這些人爲門口塑像？其擺放依據為何？鎮瀾宮在其官網上都沒有任何相關的說明。

演講結束後，鎮瀾宮特意準備了印有媽祖圖像的毛巾、與知名品牌聯名的礦泉水等禮品，贈送給前來參與訪談的師生，透過這些禮品，也因而呼應到鄭會長在演講過程中所分享的觀念：與其追究那些政治因素，不如更實際的思考如何創造更多的合作可能，使媽祖信仰能更廣爲人知的被發揚光大。

目前大甲鎮瀾宮除了名聞遐邇的全台媽祖繞境，以及上述提到的開辦孤兒院，作爲推廣媽祖文化與信仰的助人實踐，同時，也透過媽祖聯誼會的群體力量，積極與校園合作，尋求傳統民間信仰的另類出路。2017年起，大甲鎮瀾宮與明道大學合作推出「媽祖學院」，結合鎮瀾宮旗下的青年會，訪談各地宮廟的文化歷史，幫這些宮廟故事做紀錄，期望透過跨界合作，透過舉辦媽祖文化推廣課程及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將全世界的媽祖文化與資料，集中建置成一個「媽祖智庫」；在校園之外，更結合年輕人所擅長的網路科技，有酬的徵求直播主，來替各宮廟的活動做宣傳，省去以往聘請傳統媒體報導的支出開銷，同時也能透過新興科技的力量，讓更多的年輕人

能夠接觸到在地的媽祖信仰。

小結

大甲鎮瀾宮的存在，見證了台灣特殊的移墾社會與移民信仰，也顯示出兩岸藉由宗教信仰進行的互動與和平交流如何可能。然而，透過大甲鎮瀾宮在向聯合國申請，將媽祖文化列爲非物質文化遺產所遭遇到的挫敗來看，兩岸的政治因素並不完全消失在以「兩岸和平女神」爲名的交流中，反觀鎮瀾宮退一步成全的態度，似乎也看見了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兩岸在經濟局勢下的權力消長及變化。

隨著新世代科技的發展，傳播媒體的多元化與自營化，傳統民間信仰也在既有的資源與網絡中，尋求更多元的合作路徑，期望透過跨領域、跨年齡層的資源互助，來推廣媽祖信仰與在地文化，然而在不斷提醒著在地文化深耕的行動中，卻也始終擺脫不了移民社會的矛盾：「不管說是媽祖、還是很多王爺啦，或是說什麼神，包括我們的祖先，早期開始都是福建，中國來到台灣這個土地打拼。」而這樣渴望尋根，卻不知道以何爲根的矛盾與無處安放的認同，似乎也反映在大樓入口處的那十二座人物塑像中。

透過此次的參訪，我們得以初步探尋到大甲鎮瀾宮在兩岸交流中致力扮演的角色與作爲，透

過鄭會長的經驗分享與筆者的實地觀察，讓人得以重新反思信仰與文化中的政治意涵，以及透過宗教的兩岸和平交流中，台灣應如何解讀之中潛藏的意義與中國的意圖，在所謂尋根的脈絡與認同中，萌芽出真正的本土與在地化。



清大師生與受訪者合影留念

—師生田野紀要—

中國對台灣地方政治的影響和滲透 ——台南市立法委員郭國文訪談

朱鑒漢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郭國文為現任台南市立法委員，因為具有台灣勞工陣線、全國產業總工會等勞工運動經驗，曾出任勞動部政務次長，後於2020年回到出身地台南當選為立法委員。台南市是台灣重要的農漁生產基地，加上宮廟文化極為鼎盛，這些經濟生產與文化資本都為中國對台統戰帶來源源不絕的機會，而下文將會就中國在地方政治上如何影響滲透台南作出經驗分析。

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

2012年總統大選，郭國文參與蔡英文陣營的輔選過程，原本預計蔡英文會成功當選，但結果卻以八十萬票的差距落敗。郭國文事後經過回想及分析，發現中國因素其實在2012年的選舉上已經發揮相當作用，以一種直接的資本投放方式（例如下文提到的漁農產品訂單）呈現；而與中國因素相反，美國因素在台灣發揮之影響力偏向以心理性因素為主。以2012年台灣總統選舉為例，美國對於候選人的偏好與意向對於選情具有關鍵的影響，從2012年美台會面的結果來看，即可得知當年美國政府對蔡英文任職總統較有保留，反而更傾向馬英九維持兩岸關係，這些考量足以影響台灣民衆之政治態度。由此可見，中國因素與美國因素在台灣是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共同存在並影響選舉。

中國因素在台灣

在馬英九執政時期，中國因素的影響方式是

以寺廟作為切入點，整個台南的宮廟圈就充斥著不同寺廟支持哪一個候選人、支持馬英九某些政策等等的風氣，親中力量長期以不同的宗廟交流來累積在地人脈，再配合當地漁農產品訂單在社區內累積人情網絡，並以此作為利誘換取台灣時任總統馬英九支持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以更加強化中國因素在台灣的便利與影響力。郭國文認為，這種中國在台灣農漁產品訂單對農民政治偏好的影響在2012年大選充分發酵，造就馬英九成功取得連任後制定對中國有利的兩岸政策與法規。

國民黨於2016年總統大選潰敗，主因在於中國企圖擴大其對台灣的影響，而自2014年由《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審查所引發的太陽花運動對台灣政治局勢產生強大影響，這個影響延伸到2016年總統大選，造成國民黨下台、民進黨重新執政。2016年政黨輪替後，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在組織方式上有了新的方向與更強化的力道。而當中的影響主要體現於資訊與輿論戰的層面，據《報導者》2019年的報導指出，台灣的LINE已變成內容農場肆虐的重災區，當中至少有6成不實與爭議訊息來自海外網站。細看網站內容，可看見帶有簡體字的照片、中國用語，或是中國官方宣傳訊息。而這些不實與爭議訊息扮演著攻擊執政的蔡英文政府的角色，因此可見中國因素的影響方式會就執政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不僅止於過去資源導向的組織方向。2016年後中國以假資訊滲透台灣媒體輿論而帶動的資訊戰，成為民進黨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挫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郭國文立委分享在地觀察

「台灣人買台灣菜」，對台灣本地農業而言，本地人支持本地農業才是真正的出路。由虱目魚到文旦再到高麗菜，長期以來在台灣都是價格的問題，因此才會出現許多有心人在不同地區以農業契作為名進行買票。中共政權派出手握巨大資源的代理人在國民黨影響力不深的地區代國民黨進行收買與組織的工作，在中國因素介入之下，地方政治實在難以區分出地方派系和中共代理人的區別。

「台灣人買台灣菜」：以本地對抗中國因素究竟如何可以抗衡物質層面的中國因素？以郭委員的個人經驗而言，唯有本地市場支持本地農業才是應對中國因素在台灣的不二法門。郭委員指出台灣農業從農業生產到農產運銷體系長期存在問題，所以才會令中國因素可以染指台灣農產市場並藉訂單收買人心。而這個手段就與國民黨候選人競選策略的邏輯近乎如出一轍，如韓國瑜 2018 年競選高雄市長時就一直使用「貨出去，人進來」的口號作為競選論述。除了韓國瑜在高雄市長選舉期間如此操作之外，郭國文在 2019 年臺南市第二選舉區立法委員缺額補選的對手——國民黨候選人謝龍介亦是使用相同策略，加上中國因素影響之下的泛藍媒體全力支援，使得 2019 年台南立委補選選戰實為本土勢力與中國因素如何影響地方政治的實戰場。

郭國文認為謝龍介當時的競選策略就是以新成立公司與農民簽下銷售合約，實為對選民開出未來尚未可兌付的空頭支票。雖然中國訂單量大，但簽下比市場價格更低的農產品合約其實對本地市場有害無益，當本地農產品陷入價格競爭時，受害的只會是本地農戶，而不是居中促成交易的中間人。

中國因素造成下的問題

有鑑於過往台灣農民問題被中共媒體帶風向做文章，郭國文認為解決中國因素之影響的不二法門就是提供價格保障並藉以改善農民權益。由行政層面著手，訂立保障收購價格，同時配合政府的大宗收購政策持續改善本土農產品市場流通性的問題。此外，加上立法層面的配合，從農民權益角度著手草擬《農業保險法》、《農民職業職災保險法》等法規，並完善社會福利網擴大至農民退休金等層面，藉以保障本地農業發展及農民權益。隨著農產品供應方的權益日漸改善，加上從行政層面保障了農民收入，逐漸堵塞住以往中國藉由台灣農業發展上的缺陷進行統戰，減少中國因素在地方政治的操弄與介入。

除了在農業問題上防堵農漁產品成為統戰缺口，國家安全問題亦是另一個中國因素影響下的一個重大議題。習近平上任以來，海峽兩岸情況日漸緊張，國安問題成為蔡英文政府一個不得不面對的議題。馬英九執政時期對中國門戶大開的策略在台灣社會形成諸多後遺症，包括中天電視換照問題、「大同案」、紅色資本借「假外資」「假港資」身分來台等等。郭國文認為這些後遺

症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而變得相對隱微，但隨著疫情因疫苗研發帶來曙光，加上本身習近平政權「戰狼外交」路線的姿態，中國可能繼續利用不同機會滲透台灣，現屆政府需及時研究法制上的修補來堵塞馬英九執政年代造成的台灣內部國家安全漏洞。

結語

台灣是一個受中國因素與美國因素共同影響的國家，中國因素以一種直接資本投資的實際因

素方式所呈現；而美國因素則以心理性因素為主要反映。因為中國因素的直接性，馬英九執政時期的台灣充滿著中共對台統戰的缺口，在台南是以農業和宮廟圈做為重點統戰對象。郭國文認為雖然這種情況隨著各地方政府強化本土農民權益與保障收購價格而有所改善，中國對台灣年輕人才的統戰策略也因為香港反送中事件而讓台灣青年有所警惕，但中國因素影響之下的民主制度問題仍然需要台灣政府長期關注與對應，以維護國家安全。



清大師生與受訪者合影留念

—師生田野紀要—

猜不到的不知所措： 兩岸關係劇變下之台灣民宿業經營

陳彙淳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2008 年台灣政府實施兩岸直航與開放中國遊客來台觀光，2008 年 6 月 13 日簽訂《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開啓了中國遊客來台觀光的序幕，並於 2008 年 7 月 18 日起正式實施。短短兩年時間，中國人民來台之人次已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尤其是 2012 年陸客來台人次更是高出第 2 名日本來台人次將近 1.8 倍，當時陸客儼然是台灣最重要的觀光客源。然而 2016 年政黨輪替之際，新政府對「九二共識」抱持存疑的態度，不承認其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中國因而施展一些反制手法，間接影響兩岸關係與交流發展。例如：暫停兩岸事務首長熱線溝通機制、宣傳軍演、限制中國遊客來台名額等。近年來，觀光旅遊乃是一項新興產業，隨著科技發展、社會的快速進步，觀光旅遊已成為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活動之一。限縮中國遊客來台旅遊的政治手段，對於許多依託中國遊客為生的產業如冷水澆背般，大受打擊。本次師生田野到暨大行旅拜訪現任台灣民宿協會理事長，也是前南投縣民宿觀光協會理事長——彭成裕，從訪談過程中，進一步了解南投民宿產業在兩岸關係變動下的因應措施。

民宿的認識

民宿顧名思義就是利用自用住宅空閒房間，或者閒置的房屋，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就彭成裕理事長而言：「民宿就是提供給遊客在鄉下或都市的邊陲，一個可供人睡覺的產品。但是到後來衍生至今，等於是精緻旅遊或高端旅遊產品的一個變形。」

根據觀光局統計資料，截至 2020 年 5 月，全台合法民宿家數是九千四百六十三家。¹ 根據推估，民宿產業的產值，一年大概可以創下六十四億，而平均房價大概是在兩千五百塊台幣左右。房價在一萬塊以上，甚至快兩萬的，有時會感覺到它們沒有人情味，彭成裕理事長評析，因為這些民宿是很專業的，服務很細緻，它們就不是用人情味來做民宿經營的理念，由此可見民宿的產品定位十分多元。進一步談到房價的地區差異，台灣民宿的總平均房價是 2500 元，而南投縣的平均房價則將近 3000 元。這是因為南投有日月潭、清境農場等國際知名景點，所以這兩個區域就把平均房價拉高。而在民宿的地區分布上，台灣民

1 在 2001 年，台灣《民宿管理辦法》對於客房數的規範為「一般民宿」是 5 間以下，「特色民宿」15 間以下，總客房面積則是一百五十坪以下，後來在 2019 年 11 月，正式通過《民宿管理辦法》修正，現在「一般民宿」可以到 8 間，總客房面積可以到兩百四十坪。至今不再是以房間數界定民宿類別，排除原規定 5 間以下為「一般民宿」與 6 至 15 間為「特色民宿」的區別。農業用地的農舍，總客房面積為三百坪。一般建地則可以到四百坪。早期的民宿主要是以自住以外的剩餘房間作為營業，到了 2001 年《民宿管理辦法》施行之後，就出現大量投資興建而營業的民宿。取自程立民，〈簡評南投縣民宿管理輔導自治條例及民宿管理政策〉，《國會季刊》，第 47 卷第 1 期（2019 年 3 月），頁 23-41。

宿數量前六名的縣市，第一名花蓮縣高達一千八百多家，這個家數是有執照的。日租套房或沒有執照的加起來，總數超過一萬五千家。對於協助民宿合法經營的部分，台灣民宿協會還在努力輔導。

何謂台灣入境旅遊觀光？

彭成裕先生闡述，「入境旅遊觀光」就是外國觀光客來台灣，在台灣我們稱作 inbound。不管是藉由坐船或坐飛機，或者只要是從境外入境到台灣，要經過海關檢查的這些旅客，都叫作入境的遊客。為了協助台灣觀光產業發展、提升入境旅遊服務品質，許多旅行社跟觀光產業業者共同發起成立了台灣入境旅遊協會。

去年台灣總入境人次約略是一千一百六十萬，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遊客在統計上屬於國際人次，因為他們是拿非台灣護照，只要拿非台灣護照都算國際人次。台灣的外籍勞工，也都有算到國際人次裡面，因此這一千一百多萬人次多少還是有些參雜，不完全是入境旅遊人次。扣除外籍勞工、來台灣就讀的外籍學生和華僑以及公務出差的人次，參考 2019 年交通部觀光統計年報，真正的國際遊客大約是八百多萬。²2010 年入境台灣的中國遊客大概是一千一百六十萬人次，那時候由於台灣開放陸客來台，相較前一年增加了大約六百五十九萬人次。³馬英九主政時期大量開放中國人民赴台旅遊，從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到三線城市逐步開放，當時總共開放了四十幾個中國城市可以直飛台灣，中國飛台灣的航班與日俱增。2016 年台灣政黨輪替之後，因為兩岸關係的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中國遊客就從四百多萬減少到兩百七十幾萬人次。



彭成裕先生分享自身的經歷與觀察

陸客減少對台灣民宿業者的影響

彭成裕先生自 108 年當上第六屆台灣民宿協會理事長後，在全台開會時才發現中國遊客減少對台灣旅遊業影響很大。以韓國觀光客做比較，韓國遊客在 108 年的時候，已經有將近一百五十萬人次左右，可是在桃園或台中幾乎看不到他們，高雄則勉強有；大多原因在於目前台灣自由行以雙北和高雄交通較為方便，其他地方都稍顯不足，外語服務與溝通也不太通順。就旅遊業的慣例而言，只要是到陌生地開發觀光市場一定是先從團體旅遊開始，讓更多外國旅客漸漸認識台灣之後才會有自由行遊程的發展。台灣的旅行社在韓國推廣台灣觀光已經有二十年了，所以從 99 年左右韓國來台旅客人次就已經開始增加，到後來暴增。暴增的原因是自由行的人次增加，團體也差不多。而談到韓國與中國遊客經濟效應的差異，由於韓國的假期比較短，他們來台旅遊的遊程大概只有三天兩夜或四天三夜而已。縱使韓國遊客消費人次很多，但同樣的人次底下，韓國遊客人均消費就沒有中國大陸高。相較之下中國遊客的經濟貢獻度則高於韓國遊客，因為他們一來就是至少七

2 交通部觀光局：〈中華民國 108 年觀光統計年報〉，行政資訊網，2020 年 11 月 16 日，<https://admin.taiwan.net.tw/Handlers/FileHandler.ashx?fid=b9822147-fd02-4dda-a283-281c0d2321eb&type=4&no=1>，2021 年 9 月 1 日讀取。

3 經濟部統計處：〈觀光客來台人數〉，經濟統計數據分析系統，2010 年，<https://dmz26.moea.gov.tw/GA/Common/Common.aspx?code=O&no=2>，2021 年 9 月 4 日讀取。

天環島的基本團，甚至有十幾天的。許多人疑惑為什麼這些業者做觀光，非中國遊客不可？彭成裕理事長坦言，以商業的角度來看，為什麼要捨棄同語文的中國，放棄這一塊市場？同樣拿一百萬、一千萬去國外做行銷推廣，在中國可以快速地傳播開來，語言溝通也相較容易；但是去印度、歐洲，甚至是到非洲推廣，則費力許多。由於語言隔閡的因素，擔心沒有一定的接待能力，所以這是前幾年民宿業者一直在推中國遊客來台旅遊的原因。

彭成裕理事長提到，因為國際觀光客觀光旅遊的時段不分平假日，而台灣觀光客主要是以週休二日旅遊居多。通常一到假日，觀光旅遊景點就是四處大塞車，到處人擠人，可是到了平日，卻是門可羅雀的大反差。因此，觀光業者意欲透過國際推廣，把國外遊客帶進來，這個也是入境旅遊協會裡面的入境旅行社在做的事情；而國人出國遊玩，那個叫作出境旅遊。許多旅行社因為這一次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生意受很大的影響。

眾人拾柴火焰高：創立協會與企業合作

台灣鄉村旅遊協會是從國立暨南大學發揚光大，由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曾喜鵬教授為了促進兩岸鄉村旅遊的交流而成立。這個協會的成員大多從事鄉村旅遊產業，發展民宿經濟、精緻農業經濟；也透過協會和中國鄉村旅遊組織交流。據彭成裕理事長所述，他第一場在中國的演講、與中國鄉村旅遊民間組織的合作都是經由協會的引薦，從此展開了往後一連串在中國演講及交流的歷程。

而國內組織的串聯方面，以南投為例，目前南投縣觀光產業聯盟協會的組成包含了設籍於南投縣的旅館工會、當舖工會、銀行工會、不動產工會等組織，由這些與觀光旅遊產業有關的工會、協會的理事長們所組成。協會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協助各企業相互合作，並串聯彼此資源以增加打團體戰的優勢。

台灣民宿協會四大目標：「專業」、「前瞻」、「優質」、「有序」

「台灣民宿協會」是全台灣第一個由民宿成員組成的協會組織。現在全台灣各縣市幾乎都有民宿協會，總共有十九個民宿協會。在各縣市的民宿協會成立之前，台灣只有一個民宿團體，該團體早期命名為「台灣鄉村民宿發展聯誼會」，因為當時還沒有民宿法規。直到2001年施行《民宿管理辦法》之後，於2003年下半年向主管機關正式登記為立案的協會組織，並更名為「台灣民宿協會」。協會主要以「專業」、「前瞻」、「優質」、「有序」這四大目標作為協會運作的理念，並以此推動台灣民宿創新發展及國際連結。彭成裕理事長坦言，作為一個串聯全國各縣市民宿業者組織的代表，在產業發展的各方面，不管是產業的研究和調查，或者是相關訊息的交流，皆可以透過協會的平台來交流與聯繫。

例如幾年前，台灣民宿協會曾經舉辦台灣民宿相關研究的論文競賽，徵稿主題主要是研究民宿跟鄉村的連結，透過競賽形成一個民宿產業研究與交流的平台，由此可見協會相當強調產學合作。一般協會都有它主要專業的地方，而台灣民宿協會的主要任務在於產業輔導，並協助產業進行產品研發，此外也包括民宿相關政策的論述產出和倡議。例如觀光局在三年前曾經進行《民宿管理辦法》的修法。修法的原因是因應旅遊型態改變帶來市場需求的改變，早期旅客住民宿通常只是為了睡一晚，後期住民宿則是為了放空渡假、悠閒旅遊，因此在民宿產品型態上的法規管制勢必需要有所調整。因應上述變化及修法契機，台灣民宿協會也透過調查研究提供修法和政策上的相關論述和建議，如民宿經營規模限制的放寬，並持續串聯各縣市民宿協會，透過上述方式倡議，最終促使政府在民宿經營規模限制上的鬆綁以及市場開發等法令的修改和制定，政府除了放寬民宿經營的客房數及面積限制，並在市場開發層面上協助民宿業者在國內外的旅遊展進行推廣、曝光，以及旅遊服務品質的提升。

中國扶貧政策與民宿的發展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後，提出要發展全域旅游、鄉村旅遊，到現在的「農文旅結合」的政策，意圖把地方經濟帶起來。希望透過農業農村的整體發展來帶動農民的經濟生活。將城市部分資金導流到鄉下去；並把都市居民吸引到鄉下消費，此即為透過發展觀光旅遊的「扶貧政策」。中國現今的扶貧相關政策主要目標在於幫助農民脫貧，其中很多部分是藉由鄉村旅遊，特別是民宿這一塊來幫農民解決生計方面的問題。彭成裕理事長透過不斷的演講交流，讓中國發現台灣民宿的特別之處，跟他們想像中的「農家樂」完全不一樣。中國的農家樂就真的是農家，把空房間拿出來假日給客人住，不過到後來也都改名叫作民宿。現在中國的民宿都是走精緻化的路線，他們比較擅長的是「修舊如舊」，即在保持傳統建物主體及建築外觀風格的前提下進行設施和服務的改善。中國後來的民宿多講究「精緻化」、「專業化」、「管家化」，甚至採取加盟的方式，也就是在一個地方穩定經營之後，便到各個省份、城市經營加盟店。其中有的是資本比較雄厚的，而資本比較缺乏的，則是透過重酬、募資平台等方式募資以擴大經營。由於中國經濟發展快速，休閒需求大增，鄉村旅遊的盛行也正是因為其擁有著廣大的休閒觀光市場。誠如彭成裕先生所述，通過兩岸合作，不但有利於中國民宿業發展，還將增強台灣民宿知名度，帶動台灣相關產業發展。此外，兩岸可在互利互補前提下，建立交流合作平台，打造獨有的農業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兩岸鄉村旅遊一大發展。

兩岸交流與未來展望

藉由中國地方政府或民間組織舉辦的「民宿管家」活動，台灣民宿業者會過去中國幫助他們做民宿的培訓，推動兩岸民宿業者深入交流，定能為實現合作共贏創造更多機遇。據彭成裕理事長所述，台灣也希望中國的農村發展能夠更好，也是出自於「善」的理念，朝向正向的發展。

回到台灣民宿業近年發展的概況，中國遊客嚴重減少對於民宿業者的影響真的很大，許多旅行社、購物店、餐廳、飯店相繼倒閉。政黨輪替後，新上任的政府在處理兩岸觀光交流議題也有所轉變。綜合來看，政治對兩岸民間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彭成裕理事長期盼未來兩岸緊張的情勢可以緩和，對民宿業者來說，「不賺中國的錢，你要賺誰的錢？」他接著說道，其實台灣去中國花的錢更多，台商在中國也有幾百萬人，所以兩岸的依存度還是很高。彭成裕理事長最後強調，兩岸應透過和平交流的方式，讓兩岸人民都能達成雙贏的局面。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服務做好，而民宿業者能夠做的就是盡量藉由觀光旅遊的服務，吸引國外的人士，包括中國遊客來台灣旅遊，透過觀光旅遊賺錢。民宿會接觸到各個國家的觀光客，也就是將民宿作為「國民外交」的一個載體，透過服務來當台灣的親善大使，讓其他國家認識台灣的風土民情。面對中國遊客退潮帶來的衝擊，觀光業者必須加以思索，做好準備，開發新客群應對策略，不輕易認輸。



彭成裕先生與林宗弘老師合影留念

參考資料

趙宇飛：〈台商期待「複製」民宿經驗開拓大陸旅遊市場〉，Zi字媒體，2017年6月28日，<https://zi.media/@yidianzixun/post/ypDt8e>，2021年9月11日讀取。

—演講與工作坊紀要—

宗教超然或宗教促統？ 跨海峽道教信仰互動的多重場域和行動邏輯

演講時間：2020 年 6 月 10 日

講者：張貴閔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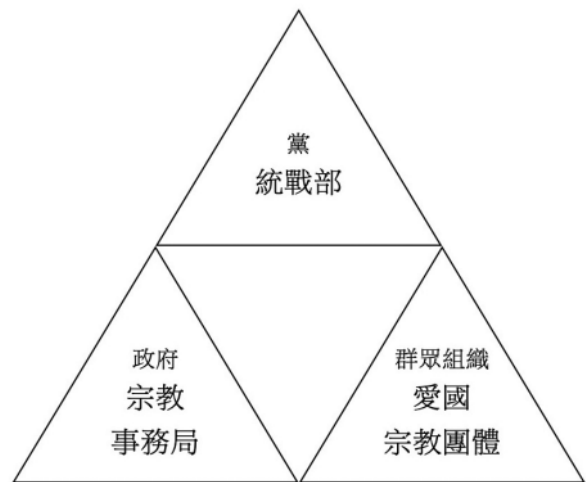
近年來，兩岸的民間道教交往頻繁，也漸漸走向制度化，然而中國與台灣在此跨海峽信仰互動中，卻處在不對稱的結構關係。中國道教團體為中共統戰系統組成的一部分，台灣則由於宗教組織多元，民間自主性強，其道教信仰場域內的權力結構複雜且分散，使得中國對台的宗教交往，找不到單一對口，驅動了具有在地知識與網絡的中間人作為牽線的需求，而台灣在地祭祀網絡複雜，導致跨海峽道教信仰互動場域中，中共對台交往的代理人問題。

跨海峽道教信仰互動有著多重場域和行動邏輯，不僅牽動著道教信仰本身，也使威權國家的宗教政治功能，展現出特殊性；宗教交流成為一種利器，一方面作為兩岸中間人，以宗教存續的外衣，內藏了個人勢力與利益，另一方面也作為中國政府維穩與促進對台交流的角色工具，兩者皆使宗教並非超然，而存在多重權力角力。

張貴閔教授的博士論文是以「中國廟產政治」為題，結合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視角的理論與田野研究，在博士後研究階段，她也以此延伸，觀察跨海峽道教信仰互動的多重場域運作與行動者邏輯。2013 年，她與南投的宮廟團體去武當山謁祖；張貴閔的阿公剛好為南投庄頭宮廟的主委，她同時具局內人與研究者的身分，探索跨海峽的政教制度與網絡，從中觀察、分析，界定兩岸互動關係。

宗教治理在中國的運作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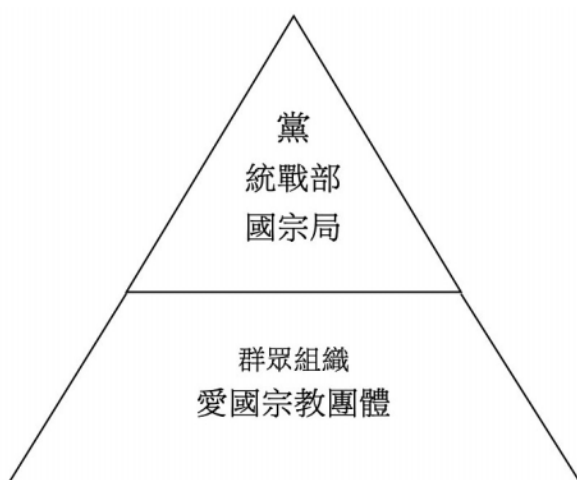
在中國，對於宗教生活的治理機構，從「中央層級」的國家宗教事務局（簡稱國宗局）、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統戰部、中國道教協會（簡稱中道協），延伸至「地方層級」的文化和旅遊局、宗教局、統戰部、宗教道協。歷史上，宗教治理的中國模式以 2018 年的合併政策作為制度上的分水嶺。



中國宗教治理制度：1979 年至 2018 年
（圖張貴閔提供）

從 1979 年至 2018 年，中國宗教治理制度中有三個重要角色（見圖一）：第一為「黨」所領導的統戰部，處理宗教相關問題研究，協助黨委制定宗教政策，以及和宗教領導人溝通，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協調愛國宗教團體與政府各部門間的互動；第二是以「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宗教事

務局（簡稱國宗局），負責執行宗教政策，和日常宗教事務行政；第三為愛國宗教團體為代表的「群眾組織」，譬如全國性、具官方性質的宗教團體，其擔任黨與宗教界之間的橋樑，幹部由黨政身份人士擔任，領導人出任人大或政協職務，並負責動員宗教界支持國家政策。



中國宗教治理制度：2018 後
(圖張貴閔提供)

這類中國宗教治理制度三角特色在 2018 年有了轉變（見圖二），根據 2018 年《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將「政府」為主的國家宗教事務局，合併進「黨」的統戰部之中，並於統戰部成立「宗教綜合司」與「宗教業務司」，對外保留「國家宗教事務局」。整併方案一方面使黨組織可以直接管理宗教，也讓統戰工作可以直接運行，節省了需繞至行政部門「扯皮」的過程，意即減少了原來所屬國宗局的行政流程，整併後在統戰部就可直接執行處理。在 1990 年代前，中國共產黨對宗教事務的介入明顯受侷限，也避開討論宗教治理，而 2018 年《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實施後，中共將國宗局併入政黨的統戰部，則企圖在對內的制度層面，呈現出政黨介入宗教的治理模式，也試圖展現政治凌駕於宗教的態度。對外聲稱掌理宗教事務的國宗局，則以民間的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的名義，操作「兩塊招牌、一套人馬」，以此進行兩岸交流，使原先所謂兩岸「民間」宗教交往互動的不對稱制度結構更加嚴重。

不對稱的「民間」交往制度結構

1988 年，開放兩岸探親，當時台灣與中國在宗教上的互動往來，兩岸雙方皆呈現分散式的管理運作，中國由地方主導，多頭管理。直至 2004 年，國宗局增設「業務四司」，在組織管理與編制上擴充轉型，將中國的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以及五大宗教以外的「民間宗教」信仰，皆納入業務四司所管理範疇。意即在制度上，國宗局開始有管理民間宗教事務的權力，將其分級，並與地方政府同步監管。2005 年胡連會後，國宗局同年也設立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使中國對台的宗教交流，正式走向制度化與常態化。張貴閔對比兩岸宗教在政策發展的趨勢發現，1988 年至 2004 年間，《中國道教》期刊討論兩岸道教交流的文獻約 13 篇，平均一年不到一篇，在 2005 年至 2018 年間，兩岸道教交流的文獻則有 45 篇，平均一年約三篇。

台灣方面，兩岸交流分析上的分水嶺在不同的宗教案例中，各自有其不同的運作模式。如 2002 年佛教的舍利子來台，使兩岸佛教交流開始掀起了「一家親」的風潮。然而，台灣各地以神明為名的文化節，如媽祖、關公、保生大帝、城隍、開漳聖王等，眾宗教組織自發組團、零星進香與參訪，在這些常態化，規模化的交往下，卻無相關的制度管理。從兩岸宗教交流制度以及歷史皆可發現，台灣對中國的宗教交流，在組織、制度與結構上，呈現著不對等的互動關係模式。

宗教管理在台灣運作模式

台灣的宗教治理模式將宗教視之為「統計上的類別」，以便管理。所有經考證，創教 50 年以上，並在台灣具有一定的信仰規模或歷史文化發展之信仰團體，皆可登記。目前 22 類登記在案的宗教類別之外，還有「其他」之選項，實務上，若向主管機關登記，通常皆會認可通過。

台灣的宗教團體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內政部民政司宗教科，相較於中國的統戰部的大規模編制，台灣宗教司人員編制僅為 5 人；主管宗教法

規也沿用 1929 年所訂定之《監督寺廟條例》，該條例中竟有兩條已宣告違憲，但由於很少宗教團體使用該條例，相對應不合時宜的法規，也甚少有人提出申請釋憲。由此可見，台灣宗教治理態度趨向於消極地避免違法，但倘若違法，也沒有適用於當今社會脈絡的法律條文來管制約束。對比中國針對兩岸宗教往來的制度、策略與規模設計，台灣的宗教所屬主管機關與法規，在制度與結構上，呈現著不對稱地「民間」交往制度結構。

中國與台灣宗教制度比較表（張貴閔提供）

	中國	台灣
官方認可宗教	5.5 (0.5 為其他的民間信仰之意)	22+X (X 為皆可登記)
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統戰部 宗教綜合局、 宗教業務局	行政院 內政部民政司 宗教科
立案宗教團體	14.4 萬	1.3 萬
主管宗教法規	2018 年 《宗教事務條例》	1929 年 《監督寺廟條例》

跨海峽道教信仰互動的行動邏輯

長久的信仰在社會之中已達到一種制度平衡，張貴閔分析台灣民間道教交流的宗教行為，將其動力分為「內生邏輯」與「外生邏輯」兩種行動者邏輯。內生邏輯為信仰者維繫內部信仰的行動邏輯，制度內生邏輯指社群內的分香廟，以及向「祖廟」進香、謁祖，增加自身神聖權威等行為。外生邏輯為台灣宗教市場競爭激烈，宗教組織為爭取宗教市場份額和擴大信眾基礎，會競爭神系內的宮廟位階，也就是嘗試「越級」回至宗教的發起祖廟，並聲稱在該神系內的宮廟位階競爭中勝出，以爭取更多的宗教市場與信徒。

就兩岸宗教交流而言，台灣相對有軟實力，



張貴閔老師分享對兩岸宗教研究的看法

像是台灣保持儀式的傳統性、制度，並維持高度誠信；但在另一方面，台灣宗教團體多半帶著大中華文化霸權的意識形態影子，例如他們認為，台灣的宗教文化在保存與傳承性上優於中國。然而，這是內生邏輯上所呈現出的優越意識，若談到外生邏輯的影響，台灣宮廟為取得神系內宮廟位階競爭的勝利，卻放棄此優越意識，反而爭相去到中國大陸的祖廟謁祖，藉以提升該信仰社群在台灣位階，以及賺取兩岸統戰環境下的政經紅利。

在宗教制度以及交流權力結構的不完善，使兩岸間的宗教交流不對等，間接成為了中國統戰的破口。雖然宮廟負責人不見得能影響信眾的政治傾向，以及短期的兩岸宗教交流也不一定能轉移參與者的政治認同，但這幾年來相關領域的中國研究，發現中國對台灣的統戰手法已漸漸不同於以往以商逼政的模式，而是由更加軟性的文化、媒體、宗教等途徑，影響台灣社會。台灣該如何在制度上加以防範，便成為了重要的課題。

（記錄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洪嘉穗）

— 演講與工作坊紀要 —

過江菩薩出洋……去

演講時間：2020 年 10 月 7 日

講者：劉宇光

上海復旦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前言

劉宇光教授任教於上海復旦大學宗教系，研究領域為宗教哲學。演講之初，劉教授先以海報中與自身合影的泰國社運耆老 Sulak Sivaraksa 談起。這位長者本身多次被泰國政府以「對國王不恭」為罪名而遭到控訴，並在某次舉辦於日本的佛教盛會中，為「中國政府不滿達賴喇嘛出席而向日本政府施壓的行為」抱不平後，遭到中國的禁止入境。透過 Sulak Sivaraksa 的遭遇與其本身經歷的事件，進而帶出中國如何以佛教作為政治外交的手段，以及企圖擴張自身政權在東南亞各地影響力的野心。

中國以佛教作為政治外交與對內治理手段的種種現象

在劉教授多年來的觀察中，中國共產黨經常利用佛教從事政治外交與對內治理的手段。對外，中國透過不斷向外宣稱自身作為「佛教新祖國」的地位，企圖削弱印度身為佛教發源地的歷史位置，並結合發源於中國本土的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從印度手上奪下佛教的話語權，進而以宗教之名，增加自身在東南亞一帶的政治影響力。對內，中國透過宗教進行大內宣，但其目的並不是

為了將佛教信仰發揚光大，而是在既有的信仰人口上，期望透過塑造某種結合國族認同與佛教信仰的意識形態，讓中國本土內超過三分之二人口比例的佛教信仰人口，能夠信仰「中國佛教」，進而確立政權對於國內宗教信仰的掌控力度。

以 2006 至 2018 年舉辦的五屆世界佛教論壇為例，¹ 劉教授觀察到，在這些論壇中，以第一屆的規模最為盛大，接連著的後續幾屆卻是逐漸萎縮，甚至參與人數是由原先的上萬人，掉落至幾千甚至幾百人。除了規模縮減的幅度之大，甚至與會的形式也由公開形式轉變為非公開，讓人不禁好奇這樣的安排有什麼樣的特殊含意。細究其因，劉教授提到，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雖將其論壇打造成國際盛會，邀請各國重點人物參與，然而卻因自身長久以來對佛教文化的刻意打壓與忽視，使得該論壇缺乏佛教信仰中深刻的文化底蘊，而流於形式，這對真心渴望前來參與盛會者無疑是一種莫大的阻力；與此同時，在刻意公開宣傳論壇後，中國大外宣的基本目的已經達成，故而從第二屆開始，這種宗教性質的聚會就必須回到中國官方的管控之下，刻意選擇不完全公開的方式也使得與會者連年下降。有趣的是，演講中劉教授提及，其實中國舉辦的並不是只有佛教的盛會，只不過對於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甚至於道教等宗教活動的組織者而言，他們都會有個共識，

1 世界佛教論壇由中國佛教協會和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共同定期舉辦，首屆世界佛教論壇 2006 年 4 月 13 日至 16 日在中國浙江省杭州和舟山市舉行；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 2009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在中國無錫靈山梵宮，並在台北舉行閉幕儀式；第三屆佛教論壇於 2012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在香港舉行；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於 2015 年 10 月 24 日在江蘇省無錫市舉行；第五屆世界佛教論壇於 2018 年 10 月在福建省莆田市舉行。



劉宇光老師分享自身研究

那就是自己信仰的宗教在中國只是配角，佛教才是主角。

除了興辦世界性的佛教論壇外，隨著一帶一路的政策，中國也興辦「南海佛學院」，藉此招收來自於柬埔寨、寮國等中國衛星國家的佛學生，在中國學習「中國佛教」，並期望這些學生學成後能夠回到自身母國將其發揚光大。

為什麼是宗教？為什麼是佛教？

中國政府為何選擇宗教、又為何選擇佛教作為政治外交手段，在這當中有許多的國際政治考量。對於中國而言，宗教一直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負資產」，由於在宗教自由上一直被國際社會指控，因此，中國想到一個對策：「先把國外的宗教引進來看，再把我們的宗教走出去交朋友，這樣就能讓他們了解之前是一個誤解；其實我們還是有宗教自由的。」因此為了消弭這樣的指控，同時也由於考量到自身與周邊東南亞國家文化的相近面，中國選擇了以宗教作為推廣自身勢力的絕佳手段。

之所以選擇佛教，主要係源於中國透過佛教

在 2000 年之前獲得的成功案例，² 其中最著名、也最具延續性的，便是中日韓三國佛教的「黃金紐帶」。透過二戰日軍侵華的歷史記憶與日本對中國的歷史罪疚感，中國成功的將「

中國式佛教」傳播到日本境內，並透過跨國合作進一步延續其自身影響力至韓國。因而此次的佛教外交，雖然成功，卻也被視為消費歷史罪疚感的佛教補償政治。儘管如此，中日關係卻也因為此次的互動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強。

透過行銷自身身為「佛教新祖國」的身分，並主掌佛教話語權，中國的目的絕不僅限於與周邊國家建立友好的地緣關係，實質上，「宗教的進入，就是政治的進入」。當中國將「中國佛教」作為一套國際政治的互動工具，則其論述的模型與思維邏輯，同時也成為一套劃分敵我的判別標準，透過潛藏在信仰認同中的劃界，更有利於中國政府對意識型態的傳播及其進程進行管控。中國政府可以透過檢視與其互動的國家對於這套「中國佛教」論述的配合與否，辨別出這個國家對於中國而言是敵是友。對內，亦可透過認可與否，來判斷是否要為國人貼上異議者的標籤，從而增進使國人順服治理的力道。

除此以外，中國選擇佛教的另一關鍵原因，或者說刻意加重其推動力道的關鍵因素，乃是因為藏傳佛教領袖達賴喇嘛的流亡。在前述中曾提及中國為刻意打壓印度在佛教敘事上的話語權，而營造出自身為「新祖國」的特殊地位，然而隨著達賴喇嘛流亡至北印的德蘭薩拉，印度對於中國的威脅性加劇。不只是佛教發源上的敘事權，位於北印的達賴流亡政府也正是一個活生生的政權威脅，因此，唯有刻意地將印度在佛教中的影響力就地封鎖在印度國門之中，才能確保中國後續的論述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持與認同。

具體案例

接連上述所提及的藏傳佛教與北印的流亡政

2 除文中提及 1990 年代的三國佛教「黃金紐帶」一例，另外 1950 年代的南亞佛教亦被講者視為 2000 年前的成功案例。



劉宇光老師與清大師生進行交流討論

權，劉教授花了很長的篇幅論述尼泊爾案例與印度的「身毒」案例。

尼泊爾案例，主因於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與企圖將印度在佛教地位影響力封鎖在其國門內。透過歷史的查閱與考證，中國發現佛教雖起源於古印度，然當時的古印度版圖實質上亦包含了現今的尼泊爾，故而儘管在佛教中較具優先地位的佛陀傳教、講道、涅槃等重要聖地，都位居在現今的印度境內，然而，卻因為印度本身在佛教景點的旅遊管理上並不具太多心力，使得該地雖具聖地之名，卻未能有太大的吸引力成為信徒及遊客的朝聖重地。此一現象，也讓中國掌握到關鍵的機會，從而將位於尼泊爾境內的佛陀誕生地作為「新聖地」而積極推廣。然而若要建立此一聖地觀光，尼泊爾本身並沒有太多餘力和經濟資源打造這樣的景點及其所需的基礎設施，因此中國透過興建學校、醫院、飯店、公路、給水系統等基礎建設，換取尼泊爾對中國的依賴與配合。劉教授甚至提及，尼泊爾對中國的經濟依存度之高，形同被中國買下一般。到了2013年，中國在尼泊爾的基礎建設已大致完成，此後，不只便於推廣由中國協助建立的聖地觀光，中國更將尼泊爾作

為其在推廣佛教外交的一大跳板，試圖取代印度身為佛教母國的地位，並透過在尼泊爾舉辦的大型佛教論壇，使印度在佛教的影響力逐漸下滑。

至於「身毒」案例，講的便是印度。印度古稱天竺，亦即為「身毒」。透過對照尼泊爾的案例可以理解到，印度上至政府下至社會，其實都並不太在意佛教，因為事實上印度教才是該國大宗，佛教在其境內的地位實屬邊緣。對印度人來說，身為佛教徒，同時意味著你處於賤民階級，不是一般人樂意往來之人。因此，對於中國向世界宣稱自身為「佛教新祖國」，以及其對佛教話語權的爭奪，也迫使印度開始正面回應，然而除了近年來的佛教論壇，以及透過地利之便邀請達賴喇嘛參與的行動之外，印度企圖以成立佛教學院重拾自身在佛教領域的地位並吸引亞洲學生前來就讀的計畫，並未獲得明顯的成效。透過上述兩例，皆能明顯看出中國透過佛教作為國際地位提升與話語權移轉的手段，其影響力已經在各國持續發酵。

（記錄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游佩宣）

—演講與工作坊紀要—

主流聲音之外——中國獨立紀錄片發展史

演講日期：2020 年 11 月 24 日

講者：聞海

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

紀錄片可以紀錄與呈現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而中國的獨立紀錄片更身兼表露社會真實性的功能，此次中國研究工作坊邀請了由中國流亡至香港的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導演——來介紹中國獨立紀錄片之過去、現在與未來。此次中國研究工作坊為 2020 中國獨立紀錄片巡迴演出，在清大的開幕專題講座分享。當天活動播放紀錄片《赫索格的日子》，現場講者分享則圍繞著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發展、現況與未來，以此與清大師生深入探討。中國政權日益內捲化，香港情況每況愈下，在未來，華語世界裡放映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空間大概只剩下台灣。紀錄片中的中國是難能可貴的真實現況，對中國研究本身意義重大。

來自極權國度的影像

《來自極權國度的影像》是 2020 年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台灣巡迴的主題，此次巡迴上映的紀錄片則代表了過去 30 年中國獨立紀錄片的貢獻，並紀錄了中國這一個極權國度最真實的一面。其中最具象徵性的一部《沒有電影的電影節》，呈現出 2014 年北京一個獨立電影節開幕式的情況。北京警察當時收到消息，圍堵整個影展場所，最終影展以腰斬的形式完結。聞海導演自 2013 年起，作為該影展紀錄片單元評審委員，見證著 2013 年電影節閉關自守的形式，到 2014 年「沒有電影的電影節」；自此以後，獨立影展便於中國境內消失。

回溯至 1949 年，中國實行極權的統治，全國所有傳媒、藝術工作者都搖身變成黨的宣傳機構

與喉舌。在中共眼中，影像與藝術內都沒有「人」的概念，只能作為宣傳機器，為黨、為國家服務。特別在中共的意識形態下，相對於各種不同的表演藝術類別，電影為控制得最嚴格的一類，因為早在 1920—30 年代，列寧就已經指出電影的重要性：電影播放必然聚眾，放映內容若具有煽動性，就可以成為奪取政權的有力工具。電影亦讓人覺得「眼見為實」，藉此可以教育群眾。因此，毛澤東時代若要拍攝與觀賞電影都極度困難，非得有政治關係上一定的職位，才有資格去看電影，在文化大革命時，普通老百姓只能看八個樣板戲。

首批極權國度影像的紀錄者——西方左派導演

在中國這段極權統治期間，只有兩位具有左派背景的西方導演拍攝到中國的面貌——伊凡斯與安東尼歐尼（Joris Ivens & Michelangelo Antonioni），前者是共產主義運動第三國際的知識份子，後者為義大利共產黨的黨員。伊凡斯在文化大革命前拍攝了最重要的一部紀錄片——「愚公移山」，並於 1976 年在法國公映，同年毛澤東去世，他認為，即使在毛澤東去世後的中國，政權仍然會非常穩定。但是實際上，一個月後，政變就發生，四人幫倒台；伊凡斯的回應被視為為中共搽脂抹粉，因而落入一段十年的事業低潮。1989 年，天安門事件中，他在法國支持北京學生運動；他以自己在中共老幹部裡的人脈，遊說政權不可鎮壓學生。可惜他在事件不久後過世，未能持續發揮影響。

安東尼歐尼於 1971 年來中國，原本計劃拍攝期為一年，但中共只批准其中的 21 日可以拍攝，同時中國政府派一個人跟著他，他拍什麼，那個人就照樣拍什麼，之後還得審查。他在這 21 天時間跑了中國好幾個省，在走馬看花的情況下未能深入了解地區實況。後來他完成了片長 4 小時的作品——《中國》，因為拍攝電影需要許可證，政權不允許民間記憶的留存，且「解放」前的影像紀錄都會被燒毀，所以這部作品顯得格外珍貴。

從獨立導演的誕生到獨立紀錄片之轉向

過往的中國社會在經濟上沒有自主性，那就沒辦法發展精神的自由。90 年代是一個政治氛圍比較鬆動的年代，改革開放帶來一定程度上的經濟自由，亦由此建立起精神自由，同時中國開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導演並開始拍攝電影。

90 年代初的獨立電影圈規模很小，學生只有兩個地方可以學習拍攝電影：北京電影學院，以及 90 年代後期建立的北京廣播學院，不像現在，不同地區電視台有所增加，中央電視台也由 1 個台變成 13 個台，所以電影工作者若在電視台打工，就能接觸到高價的拍攝器材。90 年代的電影通常有兩個版本，一個在國內播映、一個在國外比賽，且這些導演很快就被招安至體制內，成為高官，例如拍下《天安門》的導演就搖身一變成爲中央電視台片場的廠長。

1997 年，聞海導演舉辦了一個影展，回顧 1997 年之前獨立紀錄片。當年有三個原因令中國的獨立紀錄片發生重大轉向：

第一，1997 年，日本松下電器推出了手提 DV 攝影機。DV 攝影機的價錢對比起廣播級攝影機不算貴，但卻可以拍出差不多水平的影像，所以愈來愈多人使用 DV 機拍攝，並自己搞定整部電影後期製作。

第二，電影受惠於因盜版而提高的流通性。以往中國看電影的門檻要達到中共團級以上幹部資格，因為中共政權將文化資源與產品視爲特權，譬如江青作爲第一任中國電影局局長，她才有權看西方最好的電影，又例如北韓領袖金正日亦收

藏了上萬部電影。盜版 DVD 與互聯網釋放出更多的電影資源，並出現影評，這群觀眾與電影工作者形成碩大的文化圈，更促進資訊流通。

第三，本土電影節開始出現。中國的獨立導演通常在海外放映，2001 年後，這些影片開始在雲南、南京、北京等境內重要的影展上映。參加海外影展雖然可以獲得獎金，資助拍攝下一部電影，但語言問題使得交流不順暢。然而，本土的電影節猶如「波蘭的劇場」——你說一句話，其他人都明白你想表達什麼——沒有語言阻隔，彼此能交流處理與拍攝對象或警察的關係、如何申請資助等問題。尤其導演間可能一年見不到一次，本土電影節的交流機會對導演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鼓勵。

這三項原因令中國的獨立導演群體日漸壯大。90 年代只有 8 位紀錄片導演，千禧年代頭 10 年內就誕生了幾百位獨立導演。電影作品數量多了幾倍，題材選擇、作品深度與敏感度遠遠勝過 90 年代的作品。再者，獨立導演數量上升，部分人更出身於記者、工人與農民等等不同社會階層，導演背景逐漸多元化。這場 1997 年的回顧展亦反映出時代特色，特別選用了風格多元化的作品，有些表現激烈，有些詩情畫意。

1997—2014：中國獨立電影的高峰

1990 年代的中國電影導演都是受薪工作，因為導演拍攝時要通知包括政府在內的不同單位，因此政治紅線，也就有強烈的自我審查傾向。

1999 年，胡杰出道，他曾是南京新華社的工作人員，日常就是幫政府人員拍攝參觀行程的影片。然而他辭職明志，捨棄跟官方的任何關係往來，去拍紀錄片，因此他的作品對中共的批判十分有力。胡杰的經驗令之後的新導演都嘗試與體制脫離關係，原因是從學習電影、製作電影以及傳播都已不需要依賴官方體制，亦因此中國才有可能出現真正的獨立電影紀錄片。

到了 2014 年，中國獨立電影完全被中斷，彷彿不存在，即使私下還可以拍，但公開影展不復存在。拍了第 5 部電影後，聞海導演發現這不是

通往紅地毯的路，而是通去監獄的路。2010 年他遭受了秘密審訊，更有 2 年的時間被禁止當導演。

為什麼中國的藝術工作者到最後站到了國家的對立面？實際上跟中國的公民社會變遷也是有關連，因為中國獨立紀錄片都跟社會息息相關。例如紀錄片《淹沒》描述關於杜甫與白帝城的主題。杜甫有很多詩都在重慶詩城所寫，但因為三峽大壩工程卻遭拆遷，連歷史名城「白帝城」也將淹沒。

正由於 DV 普及化，國家的大型工程得以留下民間影像。《淹沒》以「直接電影」的方式拍攝，沒有旁白。導演解釋自己反對中國新聞聯播的形式：中國所有新聞、紀錄片都有解說，都在告訴你發生什麼事；直接式電影就訴諸觀眾投入去現場，自己去領悟發生什麼事，這種「在場性」就是中國獨立紀錄片最偉大的地方。

另一具代表性與在場性的紀錄片則是著名維權人士——胡佳——被軟禁時，自己用 DV 拍下



聞海導演與清大師生分享自身觀察

了紀錄片《自由城的囚徒》，以紀錄警察看守期間的日子。他認為，即使警察受體制命令做事，但他們也有責任「被紀錄」。在波蘭共產黨倒台後，當地人找到當年拍下的底片，都是共產黨國安人員所拍下的人民生活紀實，政權拍下被監禁者的影片比比皆是，但這部作品是第一部由被監



聞海導演與清大師生合影留念

禁者拍攝自己的紀錄片。

公共媒體本身應該促進社區交流，但在中國就變成黨的喉舌，媒體只讓公眾看到共產黨想讓人民看到的一面，其他未看到的被當作不存在。例如 7 億農民工與親屬平時隱身在社會中，一到春運才冒出震撼的人潮，但這些普羅大眾才是社會的主體，而非數千萬的共產黨員。中國的獨立導演能夠看到社會真實面的獨到之處，就在於他們在黨的眼中就是社會底層、邊緣人，因為他們紀錄被官方遮蔽的主流世界。例如紀錄片《上訪》中，逃避城管追捕而被火車撞死的上訪者、文革大躍進死的數千萬人、汶川地震裡死去的學生，若沒有紀錄，他們只是一個數字，或者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存在。

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未來

當前中國獨立紀錄片面對到作品產量銳減，因為經驗老到的導演在習時代被迫流亡海外，年輕導演面對的監控程度比起前輩，更是以幾何級數上升。那麼，當導演不在中國，又如何繼續承擔紀錄不被注視的大眾的工作？有的被迫要帶走在中國境內拍的素材，流亡之後再完成後期工作，發表作品。例如趙大勇導演的作品《一個說不》所紀錄的城中村迫遷事件，就是發生於 2009 年，卻足足等了十年才完成。對於成為政治難民的獨立導演們，難民議題、流亡生活皆是共同的生活困境。未來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藝術家、維權律師、少數民族與香港人正在共同構建起流亡者的多元面貌，或許隨著異議者的遠去，拍攝議題亦因此漂流至全世界。

（記錄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朱鑒漢）

—演講與工作坊紀要—

「變局中國」座談會

演講時間：2020 年 12 月 8 日

講者：吳介民、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古明君、沈秀華、陳明祺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陶逸駿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黃兆年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講者輪流分享對中國局勢的觀察

2020 年發生了很多影響世界的大事，新冠肺炎疫情、美國大選、香港政治局勢進一步惡化，連同近年的美中貿易戰和中美關係持續惡劣，世界對未來的美中關係普遍抱持悲觀態度。在西方國家應付疫情而自顧不暇之際，中國政府以大外宣的手法，透過對比中國和西方國家處理疫情的

手法及效果，藉此突顯中共體制的優越性。對於中國和世界局勢何去何從的問題，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學者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和未來的世界局勢。

吳介民老師： 美中台港的多邊關係與國際形勢

吳介民老師先談美中對抗的局勢。美國總統大選剛過，全世界都在關注美國對中政策的走向，會如何連帶影響未來對台和對港的政策，而中國對港的政策也取決於美中關係的走向。他認為美中台港多邊關係中，美國和中國進入非常激烈的對抗狀態，牽動了香港的局勢。中共現時的明確對策是消化香港，進一步全面管治香港，美國可以做的就是一些保護香港的作用，對涉港事務的中港官員進行制裁，發佈對中國抵制的名單。中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就是吸納併吞，希冀最後取得台灣的領土和主權。應對中國對台灣漸趨明顯的意圖，最近兩年美國對台灣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協助也增加很多，台灣跟美國是一個「準盟友」的關係；這也使台灣在救援香港議題上有比較強的底氣，台港之間就是戰略互助關係。

外界最關心的是新任美國總統拜登的團隊對中政策的改變，將會影響到對台和對港的作為。可是就目前現況觀察，現時團隊的立場並不是那麼明確。除此之外，吳介民老師認為拜登政府大致有幾個政策方向是確定的，第一是美國會重返多邊主義，改善跟盟友的關係。需要注意的是美國近年開始走向單邊主義並非僅由於川普執政影響，而是從本世紀初已經開始形成的架構。第二是，美國會重返《巴黎氣候協議》，可能就此與中國有較多合作。第三是會更注重人權論述，在這可以利用香港的人權問題和政策論述作為利基，切入美中關係的轉變過程。第四，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將有所改變，例如 RCEP 的簽訂是否迫使美國重返 TPP。

就未來局勢的不確定性，吳介民老師認為要特別關注，拜登上任半年內會否放鬆對華為和中興等中國科技巨頭的抵制，這尤其牽涉到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中國在拜登當選後加強整肅香港，在國安法實施之後廢除香港僅有而有限的民主代議制，從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進行大逮捕、切斷外國援助、阻斷流亡路線、指控科大教授李靜君是港獨等作為來看，香港儼然進入了戒嚴狀

態。在西方國家方面，美國的協助力度是比較大，例如透過香港人權法、香港自治法的制定和施行，把 11 名中港高官列入制裁名單。在台灣方面，陸委會開始啓用台港交流辦公室，援港事務更制度化。可是台灣在香港問題之後出現亡國感的說法，變得焦慮和無力，於是更加需要兩岸問題方面的創新論述。與此同時也是台灣尋求國家發展新論述的契機，希望藉此令台灣社會成為全世界公民社會的一個節點，在撐港的國際隊上有更積極的角色。

古明君老師：疫情下的移動政治

古明君老師跟我們報告 COVID-19 疫情期間中國政府管理人口流動措施的整理和發現。全球各國在限制人口流動方面有不同的方法和模式，社會距離是一種歐洲國家較常用的方式，中國則比較多用人口流動的管控手法，最典型就是封城。在封城之下，有所謂「半封城」的措施，即是「封閉式管理」。去年（2020 年）2 月初期開始，中國全國不同地區都採取了各種方式的管理。例如杭州的實際操作包括進出村莊必須測溫和出示有效證件。而南京的措施則更為嚴謹，政府發佈的通告指明什麼單位需要負責封閉式管理，例如物業管理公司和社區幹部的屬地責任，以及限制來自湖北等地區的人不准進入小區。哈爾濱則推行「掛牌封閉」，如果某單位/大廈/小區/村落有確診病例，就要在門口掛牌和整個封起來，不准出入。此外同時動員行政體系，如街長、村長、樓長等，推動包保責任制，還有動員全體居民作運動式治理來控制疫情。在 2 月中武漢政府發佈了命令，隨後有很多政府就跟著做，就是將整個社區圍起來，只留一個出入口，安排人員 24 小時值班和測溫，只有一些人可以外出，其他人就不能。到了 9 月開學後，就將封閉式管理運用到高校上。有些學校就運用科技式的管理，例如掃碼和掃臉。大部份是沒有必要就不能出校，更多學校是直接把學生關在學校，引起了學生騷動。

但是封城、封閉式管理等控制人口流動的措施，阻礙了經濟發展。在經濟活動恢復之後，由

於復工使人口重新流動成為必然，因此各地政府也陸續建立起健康碼的制度，例如深圳和北京。在中央的一碼通政策後，各地各自的健康碼仍然繼續運作。這些地方的健康碼會追蹤所有人的行動軌跡，甚至會標記出一些特殊人群，例如來自新疆和武漢，因此造成了一種標籤化的現象。最後古老師提出幾個從封閉式管理中觀察到的現象，第一是「摩擦系數」的概念，每個人在政府眼中的系數都不一樣，系數高的就是政府不想那些人移動，這是移動政治中不同人的移動差異。第二是中國動用了過往的人口治理模式，用運動式治理的方法來限制人群流動。第三個觀察就是在一些內部飛地像黑人聚居的地方，或者國際邊境的交界，難以用以前的人口管理模式做管理

陶逸駿老師：從疫情看新型舉國體制

陶逸駿老師談的是以舉國體制的角度看中國政治的一般性觀察。陶老師認為疫情不但沒有對中國的威權政治造成傷害，因為中國政府權威的基礎是建基於恐懼、幻想和資源依賴，疫情對這三個因素反而有鞏固的效果。舉國體制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毛時期，在習近平上台後再次提出舉國體制，稱為「新型舉國體制」，以前主要著重在工業技術上達成產業升級，以及培養在國際性運動會上參賽的運動員。而目前這種體制則擴散到防疫上，表面上中國對疫情的控制看起來似乎比較好，與西方形成秩序程度的對比。中國這套體制包含一套可受管控的人，以及可以肆意做出封城等措施的政府。在西方制度下無法進行隨意封城和強制戴口罩等措施，而中國式的治理缺乏自願性和同意性的基礎。不過舉國體制也是有很大的缺點，體現在三個面向：第一是權力的轉移，政權更迭非常困難；第二是知識創新的問題，很難達到自發性的創新；最後舉國體制有很多委託及代理問題，中央政府無法控制底下的官僚和地方政府，使其朝鞏固中央政府體制穩定的方向前進。通常地方政府、企業或是一些公眾人物希望透過短線的操作來賺錢，也不會想很遠的事情。例如最近發現了一些網紅，像胡錫進、金燦榮這

些人以公眾號營運公司來發愛國財，利用小粉紅的愛國心去撈短期的錢。此外像蛋殼公寓也是要撈短期的錢，全國有 40 多萬受害者並不是舉國體制會去照顧的一群人。最後，陶老師認為舉國體制實際上是有上述致命的內在矛盾，會讓中共所聲稱的文明秩序的對比和優勢在一兩次的重大危機喪失掉。

沈秀華老師： 中國公民社會下的女權運動

沈秀華老師主要從公民社會中的女權運動的角度來說，女權運動是中國民間近十年來運動量很大的運動，並持續至今。中國公民社會被限縮到很小的空間，可是這些運動仍然有一定的韌性並能找出出口，而這方面跟運動者參與運動的動機、對中國社會的想像都會影響到他們與體制的關係。以往女權分子依賴社交媒體來做動員，可是在 2015 年後空間就愈來愈小，另外在 2018 年時在北京的「女權之聲」被關停，有些曾經接觸的女權分子離開中國、被捕被關、被失蹤、轉行都有。運動圈裡就產生資源有限的問題，使他們思考該如何運用僅有的資源和策略，並產生爭議和矛盾。在運動的孤立性方面，女權分子在訪談中表示在社會上站到愈來愈邊緣的位置，開始出現自我審查，隨著中國社會運動議題之間的橫向連結愈來愈少，對於運動作為生命重要部分的運動者而言可說像是喪失了生活上的目標。可是在有限的公民社會裡面，運動者還是透過不同的方法來運作，例如分享外國推動女權運動名人的資訊、辦培訓活動、在肺炎疫情封城期間主動送衛生綿、寫日記等等，最終運動者還是能夠在有限的空間中找出出口。

陳明祺老師：青年人「韭菜的狼性」

陳明祺老師要講的是中國年青世代的兩面性，並先以蛋殼公寓事件為例。住在蛋殼公寓的年輕族群並非所謂的低端人口，他們都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但就中國的金融系統而言則被視為予

取予攜的「韭菜」。這群年青人一方面對外出征，經常要聲討那些被認為不愛國的人；另一方面要面對和承受這個極不平等和缺乏社會流動的體制。除蛋殼公寓的苦主外，如李克強所言，中國還有六億人每月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幣。黨國體制最重要是底層有一群任勞任怨的韭菜，就像蛋殼公寓的受害者一樣。從天安門事件作為分界點，中國大概可以分成四個世代，第一個是在新中國建國之後出生的「紅衛兵世代」，薄熙來和習近平都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人格形成時剛好在文革的世代。第二個是「天安門世代」，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十年的時代，對於西方普世價值有嚮往，並認為中國還需要繼續改革。第三個是「經濟機會主義者」的世代，經濟機會開放，政治機會限縮。第四個世代則是網路管制開始發揮效應，黨國用防火牆來擋住外面的資訊，透過教育制度轉化年輕人思想，造成年青人開始自我審查。因此面對困境時，年青人仍然相信黨國的說法。最後陳明祺老師引用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在汶川地震後所提及的「多難興邦」的說法，所以韭菜的災難都是為了中國興起。

林宗弘老師：中國大陸的內捲化趨勢

林宗弘老師以香港問題來說明治理「內捲化」，他先提到「內捲」一詞的起源，引用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對民國初年黨國體制的研究，¹指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為了增加國家能力，需要掠奪人民才能生出公共財，可是掠奪又引起了更多的不滿，最後引致自己被推翻。林宗弘老師認為這兩年香港的形勢是一個內捲化和非意圖性的結果，而不是一個意圖性的結果。中港兩地政府愈希望掌握香港的情況，每一步的行動卻都朝向瓦解原初意圖達到結果的方向，最後只能用司法和鎮壓機器來打壓運動。鎮壓並不是中港政權一開始的打算，從陳同佳案到修訂逃犯條例時並沒有搞成這個局面的預期。2018年當香港社會運

動陷入低潮期、學運領袖入獄、政府民望回升，這使中共認為正是擴張國家能力的時機，卻沒有想過香港社會的韌性如此強，在鎮壓的過程中進一步自我打擊，因此林宗弘老師強調不要高估中共的能力。在2020年11月美國大選期間，香港的內捲情況稍為緩和的同時，香港政府大規模搜捕民主派人士再開始新一波內捲化趨勢。他認為中共在香港的管治同盟正在被自己的政策打到垮掉，一生指數在2018年年初達到最高峰，然後不斷下滑，加上許智峰事件，促使進一步的金融外逃。

黃兆年老師：如何反擊中國的重商主義

最後政大國發所的黄兆年老師的題目是中共的宣傳機器和對台統戰手法。承接吳介民老師談到中共在疫情期間的宣傳有三個方面，第一是直接施力，例如中國外交部的Twitter發文。第二對內部間接施力，包括內地的宣傳、外國媒體的在地協力者。第三是國際組織的協力者，像WHO總幹事譚德塞。從國際政治經濟方面來看，中國利用重商主義統合在地和國際層次的協力者來統戰。重商主義統戰的意思是塑造不平等的交流關係，意即中國利用西方民主體制、國際化下相對開放的經貿環境，透過自身的政策工具來建構一個相對封閉與相對開放之間的不對稱交流，包括商品、資本和資訊。中國不但從這個體系得到貿易順差，以及透過大外宣的輸出，創造世界各國對中國依賴局面的表象，形成美中爭霸的宣傳目的。在台灣國內對於中國透過各種管道輸出的商品、服務和資訊沒有嚴格的管制，例如中時和旺中媒體的報導。在許多情況下，中資沒有直接介入，可是可以透過親中的港商、台商和外資來收購、營運企業。以TikTok為例，中國可以在自由世界裡營商和持股。另外，疫情中的假消息有很多來自中國。中國則以國內持續成長的消費市場作為籌碼，以國內的管制來限制國外的資本流入，或者交換

1 Duara, Prasenjit, 1987. "State Involvement: 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 1911-1935",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29 (1), 132-61.

條件。Google、Yahoo、迪士尼都是相關例子。

在國際組織方面，中國透過與開發中國家合作的跨國分工，例如「南南合作」和一帶一路，這些技術、投資、貸款和援助換取天然資源和這些國家的市場，塑造開發中國家對中國的依賴。最後透過在國際組織內一國一票的制度取得重要的職位，並重塑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例如在人權論述上、在網絡主權上要求聯合國維持中立性，讓中國提倡的網絡主權論述得到體現。黃兆年老師認為在因應的部分需要破解中國統戰的重商主

義基礎，不能簡單用自由主義來應對，所以要用民主國家之間共同利益的重商主義來對付中國的重商主義。自由世界國家應思考如何在中國的威脅下團結、對內基於自由主義價值彼此合作並形成防衛機制。機制的標準應建基於經濟互惠、人類安全，甚至進一步要求中國進入這個市場機制時解除經濟和政治的限制。

（記錄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葉潤泰）

—演講與工作坊紀要—

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China 新書發表會

演講時間：2021 年 3 月 17 日

講者：徐斯儉

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蔡欣怡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張鈞智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古明君、鄭志鵬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陶逸駿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寫作背景與特色

有感於既有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的理論及個案研究眾多，但彼此研究取徑與觀點莫衷一是，難以讓人們對於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具有一個宏觀認識的視角。緣此，本書編者之一張鈞智教授 2014 年於中研院政治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期間，萌生了以新的研究方法來分析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想法。這個想法與徐斯儉教授醞釀已久的對於中國國社關係的研究構想不謀而合，兩人便開始著手進行此書的寫作規劃工作。期間爲了釐清研究思路和架構，兩人親赴香港，與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院長蔡欣怡（Kellee S. Tsai）教授進行討論和合作。這三位學者共同編輯的專書，以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爲研究主題，邀請了十多位著名學者，分別針對其專業領域撰寫一個章節，涵蓋社區、環境和公共衛生、經濟和勞工、性別和宗教等不同議題領域，共 14 章，並邀請 Elizabeth J. Perry 教授撰寫結語，

經歷長達七年的寫作及編輯過程，最終於 2021 年初由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出版。

本書以演進式治理（Evolutionary Governance）爲核心概念，提出完整且貫穿全書的研究架構，提議從議題領域出發，觀察中國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策略和過程，如何導致政治權力、治理品質、政策變遷等面向的運作和變化。每個章節的作者依據此一架構，呈現其研究的現象與結果。除了質性個案研究方法以外，本書也使用「量化個案調查（Quantitative Case Survey, QCS）」，試圖藉由綜合不同的研究方法，以拼湊出中國國家與社會之間互動關係的完整圖像。

研究議題

作爲共同主編，蔡欣怡教授提到本書的寫作目的有二：第一，了解中國在專制環境下的治理動態機制；第二，解釋非競爭性政權的威權韌性。自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國國家管理社會的方式歷



新書發表會於清大木水書苑舉行

經了從「統治」到「治理」的轉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習近平上台以後，中國的民間社會空間有所緊縮，動態治理機制強化威權韌性的作用可能降低。

徐斯儉教授指出，人們都十分關心中國會不會走向民主化的問題，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也一直是中國研究學者關注的重要研究方向，然而多數學者偏重在個案研究，使得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缺乏一個整體的理解。於是徐教授與張鈞智教授蒐集了 2005 年至 2015 年之間，刊登在西方主流中國研究刊物上，涵蓋各個議題領域的 125 份個案研究資料，藉此進行個案研究的量化分析，以建構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不同類型，並分析其政治後果。

陶逸駿教授將焦點放在中國農村土地衝突的治理面向上，討論中共進行社會治理，維繫政權整體穩定的機制類型。他提到，中國每個地方治理成效優良的案例中，背後都有許多權力壓迫及社會吸納的影子。在他的章節所描述的是廣東南海的土地股份制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從這個案例當中看到中國的基層社會治理機制，其結合了

社會維穩與地方基層人大制度的兩項政策機制，透過「規制吸納」的手段，提供特定人士參與部分議事的管道。在看似開放民主的選舉背後，隱藏著的是中共如何計畫性地消耗這些特定人士的能量，使其不會危害中共的治理

鄭志鵬教授則環繞著中國在 2008 年制定的勞動合同法，並以此法檢視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他提到勞動合同法的制定不是重點，重點是該政策如何施行，而這個施行過程涉及到國家和民衆之間的關係變化。在 2008 年到 2014 年之間，勞動合同法在珠三角的施行處在一個低度管制的狀況，並未被每一個工廠實施，其原因在於由地方政府及台資所組成的政策聯盟爲了獲取利益，進而犧牲了農民工的權益。而在 2014 年位於東莞的裕元台資鞋廠發生了大型勞資抗爭，抗爭結束後，中央政府基於維護政權穩定的需要，因而與農民工組成政策聯盟，促成了外資與台資在勞動合同法實施的完全覆蓋，但是中資企業的勞動合同法實施仍然維持低度管制。中央政府出手的原因，實際上是希望藉此機會迫使沿海外資移動資本到西部，以符合發展中西部的政策目標，這也解釋了



與會者與講者進行交流分享

為何只有外資在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上產生劇烈的變化。

古明君教授認為，多數從事中國遺產申報研究的學者都在強調國家能力，將申遺視為國家主導的產物。而在中國媽祖文化的復興過程中可以看到，國家不同部門之間的權力運作與相互角力，以及民間社會的應對策略。換言之，中國民間宗教發展涵攝於國家宗教治理的議程，所以宗教的復興與發展在受國家控制的同時，地方宗教人士也會想盡辦法，盡可能地在官方給定的論述和治理框架下，達成他們的目的。

威權國家的侷限與矛盾

本書研究指出，社會若要獲得治理品質、政策、甚至是政治權力的改變，其關鍵的策略是採取強勢策略，但政府則面臨兩難，一方面為了治理品質的提升必須與社會行動者進行柔性合作，另一方面又害怕喪失自身的政治權力，因而在某些時候採取強勢鎮壓的手段。相較於其他類似研究，本書強調透過國家社會之間動態互動過程的分析，將有助於理解威權國家的存續與發展。

（記錄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楊士學）

—演講與工作坊紀要—

中國集體抗爭研究的幕後告白

演講時間：2021 年 3 月 24 日

講者：陳志柔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前言

所謂「抗爭政治」，按照 Sidney G. Tarrow 和 Charles Tilly 的解釋，抗爭政治的存在與否有兩個基本要件：一是要有集體訴求，而提出這一訴求的群體必須與某些既得利益者存在利益衝突；二是政府的角色，或是訴求者或訴求對象的同盟，或是抗爭行動的監視者與鎮壓者。¹ 抗爭政治意味在體制與非體制邊界發生對抗。陳志柔教授以此概念為開場白，闡釋中國集體抗爭的源頭。



陳志柔老師分享對中國集體抗爭的研究發現

體）、社會（社團）、知識（老師、學長）等三方面學習。陳志柔認為社會學研究與結構、制度、場域、資源、資本等因素密不可分，亦不可忽略歷史社會學論者所提出之機遇（contingency）、機遇事件（contingent events）之重要性；其中機遇相當重要，他並以自身際遇為例，數度於演講中提及，在某一時間切面下的行動者的能動性，即該行動者於社會中究竟有哪些選擇，亦與此關係密切。

1988 年於台大畢業後，陳志柔於 1991 年負笈美國杜克大學，在求學階段獲得中國研究之啟蒙，並前往福建閩南、江蘇蘇南農村建田野調查。在江蘇田調時期，陳志柔透過對村辦企業之研究，透過觀察該村生活，發現村民彼此間連結緊密，領會「『集體的』，是一個極為美妙的概念，集體就是集體，到現在仍是集體」。陳志柔回台後進入中研院社會所與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任職，研究中國台商，特別聚焦在東莞台商、裕元鞋廠罷工，以及中國集體抗爭等議題。就選擇研究課題，他則以自身經驗對年輕研究者提出建議：「不要寫好菜譜才找料，要有什麼料炒什麼菜。」

研究緣起

本次演講講者陳志柔教授從大學時代談起，講述「我如何成為今天的我」。陳志柔的大學啟蒙主要源自政治（權力、民主化、社會力、媒

中國騷動資料庫建構

2011 年起，陳志柔藉由國科會計畫於中研院社會所建置中國騷動資料庫，² 研究中國集體抗議事件，並由資料的整理和歸納漸漸形成具體的研

1 吳強，〈誰的政治，何種抗爭？——對於建嶸《抗爭性政治》的批評〉。

2 相關研究計畫內容及成果可參見：<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2399844>。

究課題，主要進行方式為收集所有發生在中國的集體抗議新聞報導，包含電子新聞資料庫（慧科、南方、法制日報、中央社、大紀元、多維、RFA、VOA、博訊），以及中國人權運動訊息相關網站（人權、勞工組織）。截至 2019 年，共收集一萬餘則集體行動事件之新聞報導，並經歷過錄、編碼等程序，進而集結成數種豐富多元的研究變項。陳志柔認為新聞事件報導可以提供群體抗爭作為經驗現象的觀察面向，其中包含：誰在抗議？（抗議群體、及其彼此間的社會關係）、為什麼抗議？（金錢利益、權利或對於政策及官員的不滿？）、抗議和訴求的對象為何？（誰欺負我），以及如何抗議（手法包含靜坐、遊行、打砸燒等）、抗議規模（參與人數）、甚至包含抗議發生的行政區域層級（如省、市、城鄉）等，據此歸納出數個依變項：（一）國家對集體抗爭的反應：例如可觀察員警是否出現在集體抗爭現場；（二）向上級政府訴求的集體抗爭：抗爭對

象、誰欺負我、向誰討公道、什麼事件會導致民眾向地方政府抗議未果，又向上至中央政府抗議？

（三）鎮壓和抗爭的互動模式：例如抗爭的制度化模式。

研究發現

陳志柔認為即使研究具備統計數據，亦不一定要以迴歸等研究方式呈現，說明時間序列或描述事件經過即可。陳志柔自身的研究亦採取該時間序列陳述方式，其研究結果指出，隨時間推進，中國官方在應對集體抗爭上，無論面對溫和或激進的抗爭方式，都傾向採用暴力鎮壓方式為解決手段，即所謂「以暴制暴」與「以暴制和」的情形都漸趨增加。且無論抗爭發生於城市或農村，隨時間推移，警察在抗議現場越來越傾向使用武力壓制抗爭群眾，以抓捕群眾作為鎮壓方式。

陳志柔另外則提到以質化方法進行田野調查



與會者與陳志柔老師進行交流討論

的經驗，時值 2014 年東莞裕元鞋廠罷工，其透過研究發現，參與者可分為幾種類型：（一）工人：參與抗爭者、未參與抗爭者、組織者、群眾；（二）資方：資本家、代理人、幹部（台幹、陸幹）、協理；（三）政府：中央或地方政府之公安、國保、工會，（四）NGO：春風、打工族。經親身參與研究後發現，當時的社會機制和動員結構使工人動員成功，過程中資方反動員的失敗以及政府的行動，都是抗爭過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企業與工人組織等多重行動者互動後的結果。

結語

截至 2021 年年末，由於疫情下封城或限制人身自由之禁制令等行政措施使上街表達訴求成為一種不可能，亦可能因為各國防疫隔離規定繁雜

及訊息流通的遲滯，使中國境內抗議事件難以為外界所知。然而，自接連傳出異議份子遭逮捕或消失情形可以發現，在中國境內言論緊縮狀態仍相當嚴峻。

如陳志柔教授的研究過程所示，相較於先前可透過新聞報導、現場參與等方式蒐集街頭抗爭資料，進而呈現箇中各行動者的區別與其互動機制，但如今隨疫情因素與政府漸趨嚴格的管控，散播於外界之新聞與消息已不如先前蓬勃。故此，若再採行過往研究方式可能將受到資訊不對稱的限制，以致對中央政府、抗爭方、地方政府之角色判斷流於模糊。綜上所述，中國集體抗爭研究不僅需要觀察各方互動過程，亦需研究者親身參與議題，不過隨著疫情因素變化，中國集體抗爭研究的實作可能需要另闢蹊徑以作為突破了。

（記錄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丁德維）

—演講與工作坊紀要—

最孤獨的一代 ——中國城市中老年人社會化空間的民族誌研究

演講時間：2021 年 4 月 27 日

講者：紀思婷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員

中國在 2000 年後邁入老人化社會，60 歲以上的人口占全部的 7%，到了 2016 年 60 歲以上的人口占全部的 18.1%，¹ 這樣的現象與計畫生育政策還有少子化有相當大的關聯；「老年」被視為一件重要的社會問題，但是相關的研究多關注在定量研究，目的在於找出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的方法，而大部分的研究皆歸因於「中國孝道的傳統文化」的影響，較少進一步解構「傳統」的概念。

基於上述的研究現況，講者紀思婷試圖去關注老年人在個體層次上的看法、希望與需求，以及低齡退休者等不同群體的老化經驗。講者帶著「是什麼影響我們的老化經驗」的問題意識，在就讀博士期間，進入中國做人類學式的民族誌研究（2013—2019），進而深入探索中國老年人的

生活模式和其內心的故事。這樣的田野經驗也延續其就讀碩士期間，曾經在北京的安養院所從事的老年議題研究。在這次的演講中，講者帶來她長期置身中國研究的經驗分享，以及對中國老年化社會的觀察與分析。

一個民族誌研究的思索過程

最初，講者將中國的獨居老人設定為主要研究對象，但是礙於政府的資訊不透明，以及當地的文化限制，講者無法挨家挨戶敲門詢問老人是否為獨居，因此要找到獨居老人有一定的難度。她曾加入老年人的活動——陽光合唱團²——，在團體中試圖詢問參與者是否為獨居，但大部分人給予講者的反饋並不熱情。這結果凸顯出獨居在當時的田野中不是重要的問題，也讓講者重新審視自己的問題是否重要。

2013 年對於紀思婷是關鍵的一年。當時，年長女性時常聚集在城市中的廣場上跳廣場舞，於是「廣場舞熱」與「中國大媽」成為網上的熱門關鍵字，還有許多關於炒賣／買黃金、比特幣等與「中國大媽」相關的負面新聞。這些新聞引發「究竟是壞人變老，還是老人變壞？」等汙名化的批評，卻引起講者好奇，因此將研究從獨居老人轉向「中國大媽」。「大媽」這個詞源自於中國年輕人用來指涉在毛時代生長、有一定財源但



紀思婷老師說明研究方法

1 講者提供資料。

2 2008 年創立，每天 9 到 11 點聚會唱歌，約 200 到 600 人，大多是 50 到 70 歲的退休人員。

素質低落、沒有禮貌的一代中年婦女。另外，講者注意到，相對於鄉村的老年人需要依賴子女的經濟援助，城市裡大約七到八成的老年人擁有自己的退休金³，也就是城市中大媽們過著有退休金的生活，講者據此開始描繪她們退休生活的「社會化空間」。

她花了三個月陪他們唱歌、活動，並發現這些老年團體內部的年代認同非常強烈，多數的人會形容自己是「50後的一代」、「第一代獨生子女父母」、「中國歷史中最孤獨的一代」。⁴這些團體成員不只參加合唱團，也發展出有不同空間性質的集體活動，建構出相當多元的老年網絡，例如相親會、直銷團體、唱歌、跳舞、幹休所⁵、證卷交易所等。同時，講者認識到「微信」的使用也慢慢拓展老年人的生活圈，⁶老年人在微信上慣用長輩圖和屬於老年社群的問候語，在微信群組裡也有許多關於老化的文章，分別講述「老瞭要如何養生？」、「退休以後要做什麼？」、「如何跟子女保持好關係？」等議題。這些微信群則呈現跨縣市，連結不同地域的老年文化。

由此田野的觀察參與，講者逐步發展出幾個過去沒有關注過的現象：(1) 老年空間網絡；(2) 參與者世代認同的特殊性。講者再次轉向，她轉而把陽光合唱團當作研究的起點，進而連結城市裡中、老年人的活動網絡，藉以理解一個宏觀的現象：針對新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其退休時同齡集體活動的強化（intensification）。

民族誌研究的推論

「爲什麼這一帶城市中、老年退休者，那麼興奮地參加同齡化的社會化空間？」

確立這個研究問題後，講者通過 9 個多月的觀察參與，跟著 20 多個中、老年團體一起活動。

講者深入調查其中 4 個群體，共 50 多位退休的中、老年人，⁷ 主要居住在北京和昆明兩個城市，過程中則採用非正式訪談（informal interviews）和民族誌研究。

講者的研究發現：雖然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的特色、歷史、邏輯，但是比較不同的群體屬性後，可以發現他們同時分享許多共同點、趨勢，例如：「有一個圈子的重要性」、「我們要開心，要快樂，找尋快樂的意義」、「這裡，大家都一樣」等話題，以下會分成三點說明這些現象和社會之間的關聯：

一、凝聚共同經驗的歸屬感。參加老年團體活動，就可以迴避老年人與家庭之間的關係所造成的情緒負擔。來參加團體活動的老年人通常都對自己跟孩子的關係不滿意，通常是親子之間沒有話題，彼此不理解生活方式的差異。還有一些參與者會在公園裡找到「愛情」。⁸ 另外是煩惱自己的孫子女，因為幼兒園供給不夠，學費又高，老年人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培養後代。

二、中國醫療制度促成老年團體的崛起。當中國醫療制度市場化後，醫藥費越來越高，造成掛號看診要很早排隊、看專家要靠關係等問題。錯誤制度釀成共同的不安全感，另外有老年人擔心自己患有高血壓、失智症、糖尿病等老年疾病，成爲獨生子女的負擔，所以某些團體活動訴諸「開心防癌」的養生法，減緩了這些擔心。

三、自認「最孤獨的一代」的失落感與孤獨感。多數的老人都有「退休後沒事做」、「老了沒有用」的共感，因爲這一代在毛時代被國家鼓勵要爲公衆服務，但是老年後卻沒有服務對象，因此產生心境上的落差。團體活動提供生活目標，讓老年人有了動力，例如：自己健康就是爲國家減少醫藥費；學習新知讓自己感覺有用。

3 源自於 90 年代，中國政府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需要安撫保守派的國營人士所推出的政策。

4 毛時代生長的第一代獨生子女父母，現在慢慢進入退休年齡。

5 要是退休軍幹部的活動場域。

6 2016 年，微信有七百萬個 55-70 歲的成員。2017 年則成長到五千萬。

7 團體包含：快樂小分隊、雲南省老年大學、陽光合唱團、長壽合唱團。

8 這裡指的是婚外情，通常是男性會在這裡找尋婚外情的對象以獲得情感上的滿足。



紀思婷老師分享研究發現

結論

講者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發生了幾次研究問題的轉向，但不變的關懷是研究「老年」問題。從講者的視角出發，我們看見了城市中相對健康富有的老年人是有其煩惱，他們透過參加同齡化團體試圖找到解方，也在團體中找到認同感。講者

的研究不只呈現了城市老年的故事，也讓我們看到了宏觀的社會政經結構怎麼對個人造成影響，並凸顯同一個世代所共同面臨的問題。

（記錄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邱冠瑜）

